臺大歷史學報第 52 期
2013 年 12 月，頁 251-302

BIBLID1012-8514(2013)52p.251-302
2013.6.17 收稿，2013.11.19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3.52.04

與帝國的腳步俱進
——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

顏 杏 如*

提 要

本文嘗試以個案的方式，追探一位中間層女性高橋鏡子（1884-?）的移動背景、軌跡、經驗，以及隨著移動帶來的「跨界」與國家觀、教育觀之轉變，藉此思考女性在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鏡子生於士族之家，受女子高等教育，遊學東京後走入家庭，婚後足跡遠及內蒙古、臺灣、滿洲。這些移動的軌跡背後，存在著明治維新帶來的社會變動、學校教育灌輸的開拓意識、丈夫工作的不順遂、女子教育培養的能動性，以及日本帝國政治、經濟與疆域擴張等諸多內外在動能的交織及作用。

在蒙古開學堂、活躍於殖民地的在臺日人社會、參與女子高等教育機關的設置，隨著外地經驗的累積與教化團體的接觸，鏡子的國家意識與教育觀也不斷強化。在日本本土屬於中間層中被排除的社會邊緣者，帝國邊陲之地卻提供了一個得以接近權力中心、自我實現的場域。蒙古與臺灣經驗的發酵與延長，左右了其返日後的活動，更串起向滿洲的移動；移動的方式，也出現了從「從夫」、「從兄」，到「婦唱夫隨」的變化。乘著時代之風，鏡子將其外地經驗撰寫成書，重新解釋自己的作為，鼓吹女性向外開拓，主動參與了帝國的擴張，也從帝國的邊緣看到了日本帝國。

鏡子的移動，不僅是地理疆界上的移動、跨界，亦是社會階層的流動、男性／女性社會規範的越界，同時，也顯示了國與家之間的連結、兩難與界線的游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鍵詞：日治時代　在臺日人　中間層女性的移動　高橋鏡子　外地經驗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yenhsinju@ntu.edu.tw.

前 言
一、蒙古之行——向外移動的契機
二、臺灣經驗、國家意識與教育觀的強化
三、「外地經驗」的延長
結 語

前 言

19 世紀後半到 20 世紀前半，是日本帝國急速擴張的時代。隨著帝國的向外擴張，人群移動至帝國勢力所及之處。除了為數眾多的男性作為統治先鋒，或企圖在新天地尋找發展機會而航向殖民地之外，也存在著向「外地」移動的女性。關於在臺日本女性身影的勾勒，目前的研究成果與關心大抵集中在社會底層，[1]以及社會上層女性與統治者、統治政策之間的關係。[2]前者是迫於貧困而流入殖民地從事風俗業的賣春婦；後

1 竹中信子和又吉盛清指出在軍政結束的殖民統治初期，許多社會底層的日本女性流入臺灣，以娼婦、藝妓、料理屋女郎為業，其中多為來自沖繩的女性。「日本女性的移動從賣春婦開始」甚至被認為是日本帝國向外擴張時的特色之一。〔日〕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東京：田畑書店，1995），頁 34-76。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沖繩婦女與台灣殖民地統治〉，收入氏著，《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頁 49-72。〔日〕橋谷弘，〈神社と遊廓——日本植民地のシンボル〉，收入氏著，《帝国日本と植民地都市》（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 81-102。

2 當統治逐漸穩固、治安趨於良好，官吏的妻子也隨著丈夫來到殖民地，逐漸成立一些婦人團體，如篤志看護婦人會、臺北婦人懇話會、愛國婦人會等等。（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頁 60-80、130-166。）其中，愛國婦人會是既有研究中較受矚目的團體，由上流階層的女性所組成，與統治者關係密切，往往配合時局提供統治上的協助，在不同階段，扮演著軍事援護、教化、中介滲透、戰爭協力等角色。這些婦人團體的存在，顯示了在海角一隅尋求人際網絡、社交、娛樂等需求，對身處於「家」的女性而言，也讓原本「不可見」的日本婦人界「可視化」。參見洪郁如，〈日本の台湾支配と婦人団体——愛国婦人会台湾支部を中心にして——〉（東京：東京大學總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則為依憑丈夫的政治社會地位、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社群活動的官夫人們。然而，在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史料中，還可以見到另一種類型的女性——既非社會底層也算不上頂層，介於兩者之間、受中等以上教育、在殖民地工作的「中間層」[3]女性。其中一些女性甚至留下著作，不過他們在殖民地的活動卻鮮少受到注目。這些中間層女性的移動，是基於何種背景、擁有什麼樣的動機、其移動的軌跡與殖民地經驗具有何種意義，是思考女性在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課題之一。

本文嘗試以曾居住臺灣八年的女教師高橋鏡子（1884-?）為例，描繪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日本女性的移動軌跡、移動的模式、「外地」經驗，以及潛藏其中的國家意識。並沿著「日本帝國」、「殖民地臺灣」、

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論文，1995）。

3 「中間層」指在社會階級、階層構造上，不屬於上、下任一層，構成中間部分諸多階層之總稱。資本社會成立以後，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又可區分為「舊中間層」與「新中間層」。前者指處於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擁有傳統的生產技能者，包括自耕農、中小工商自營業者及專門職業者（如醫生、律師等自由業者），後者則指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而出現的大量雇用勞動者，相對於前者，無生產所需之財產，且受雇於民間企業或官廳，以獲取薪資營生。日本的新中間層大約出現在日俄戰爭（1904-1905）後，特別是一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工業化的推展，人口集中都市，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新中間層」形成，並確立其生活形態，其具有四項基本特徵：勞動形態為頭腦勞動，所得形態為受薪（salary），社會階級位於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生活水準居中。在當時有多種不同的稱呼，如中間階級、新中間階級、新中產階級、新中等階級、俸給生活者、職員層、受薪階級（salary man）等，其職業多為公務員、學校教員、公司職員、職業軍人等。嚴格說來，高橋鏡子屬於「新中間層」，她在著作中也經常自稱「俸給生活者」。不過，由於新中間層與舊中間層在殖民地臺灣的處境及其角色的差異仍是尚待處理的問題，加上筆者欲強調的是位於社會中間階層的民間日本人——相對於權力金字塔頂端的統治者、與統治者關係密切的資本家，以及社會最底層的邊緣者或勞動者——之移動與殖民地經驗，因而採用最廣義的「中間層」一詞。關於新中間層的相關討論，參見：ミルズ（Mills C. Wright）著，杉政孝譯，《ホワイト・カラー：中流階級の生活探究》（東京：創元社，1974）；〔日〕有吉広介、浜口晴彦編，《日本の新中間層》（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日〕寺出浩司，〈大正期における職員層生活の展開〉，收入日本生活学会編，《生活学》第 7 冊（東京：ドメス出版，1982），頁 34-74；〔日〕小山静子，《家庭の生成と女性の国民化》（東京：勁草書房，1999），頁 37-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庭」、「個人」幾個層次，討論中間層女性在不同場域中的活動、生命史與大時代的交錯。

高橋鏡子 1884 年生於士族之家，1924 年與丈夫移居臺灣，任職於臺北州海山郡板橋小學校。居臺期間加入臺北婦人修養會，與高官夫人們交遊往來，推動女子高等教育機關的成立。鏡子的「外地」經驗不僅止於臺灣，移動至臺灣之前，曾遊學東京，1909 年與舊越後村上藩士族高橋壯吉陸軍中尉結婚，1920 年與丈夫共赴蒙古，任職於蒙古產業公司，在興安嶺下大巴林旗大板上開辦學堂。居臺八年後，1932 年返日，在東京的滿蒙學校設立女子部，更在 1935 年前往滿洲，任職於哈爾濱學院。[4]

若將上述鏡子的簡歷，放入整個日治時期向臺灣移動的日本女性類型中思考，將更容易理解應在何種相互關係中理解高橋鏡子的位置及意義。在前述兩種移動類型中，鏡子有別於社會下層女性的移動，卻也非上流階層、高官夫人的類型。社會底層賣春婦的殖民地移動是鏡子反省、批判的對象，高官夫人所組成的團體則是其躋身、活動的場域。作為一位中間層女性，鏡子屬於在日本受近代教育養成的女教師，然而若探問其一開始的移動動機，是否可以簡單地歸類為殖民教育的尖兵呢？如何

4 關於高橋鏡子，目前並無相關的研究成果，僅有板垣邦子為復刻版的鏡子著作《感激の思ひ出》撰寫〈解說〉，描繪鏡子的生平和所處的時代背景。參見〔日〕板垣邦子，〈解說〉，收入〔日〕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東京：乙守玉緒，1942；大空社 1992 復刻），頁 1-7。此外，研究日本人在內蒙古東部經濟活動的広川佐保，曾在研究筆記中簡單提及鏡子為蒙古產業公司的職員及其著述，參見〔日〕広川佐保，〈蒙古産業公司をめぐる人々——「阿賀の館」訪問録〉，《近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会 NEWS LETTER》第 15 號（2003，橫濱），頁 118-122。鏡子尚留下其他著作與相關紀錄未被板垣、広川挖掘，在日本史或臺灣史的研究中，高橋鏡子都可以說是一位不為人知的女性。不過，日本大空社復刻出版的傳記叢書，將高橋鏡子的《感激の思ひ出》收入「婦人」系列之中，提供了理解昭和女性的一種線索，如板垣在〈解說〉所述：「乍見之下似乎是擁有特異活動的稀有人物，但與其他同時代的女性們相同，有著共通的苦惱和奮鬥。」此處關於鏡子的簡歷，主要整理自鏡子的著作。本文日文引文之中譯為筆者自譯，下同。

臺灣美術期刊資料庫

理解其向外移動的契機與背景？

鏡子的足跡，在日本本土從山形移動至東京，在日本帝國的勢力圈內，西至內蒙古東部，南至臺灣，之後更向北延伸至滿洲。跨越殖民地疆界移動的軌跡，之於女性並不「普遍」，卻也不是唯一的「特例」。鏡子的移動軌跡，存在著個人脈絡的特殊性，卻也揭示著時代中某些共通性。是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何種相互關係、社會環境、個人的自主性中，推動了這位力斥底層娼婦移動，企欲結交上層的中間層女性之移動，其背後存在著何種路徑、網絡與動能？

聚焦於殖民地的場域，鏡子如何建立起新的生活圈，如何活躍於臺灣婦人團體，並築起人際網絡？什麼樣的想法與意識支撐了鏡子在殖民地的活動，牽繫其推動女子高等教育的舉動？移動與殖民地經驗是否影響鏡子的思想及國家意識，甚至左右其日後的人生方向？

家庭之外的活動、事業、異國遠遊，這些壯舉向來給人「屬於男性活動」的印象。鏡子卻讓我們注意到，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結婚、走入家庭的鏡子，儘管安居家內，足跡卻遠及日本帝國幾處勢力圈，書寫中也充滿了鼓舞女性向外移動、開拓的言論。這樣的鏡子，如何在「家」與「國」之間擺放自己的位置？如何描繪理想的女性形象？

透過這些討論，本文企望能思考一些具「普遍性」的問題，亦即在日本帝國以及在殖民地的空間中，中間層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與女性自身的能動性。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忽視高橋鏡子的特殊性——即便與階層相近的女性們共有時代脈絡與社會環境，但也有著自身的境遇與選擇。因此，本文嘗試描繪個人與時代脈動的相互作用，透過追探高橋鏡子的經歷與足跡，理解在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中間層女性所處的位置、外地經驗，同時也更鮮明地捕捉女性、移動、日本帝國、殖民地臺灣四者交錯編織而成的歷史圖像。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一、蒙古之行——向外移動的契機

推動鏡子向外移動的，是日俄戰爭後日本的新體質，又或者是大航海時代以來人類探險活動所遺留的精神？家庭背景、經歷際遇、學校教育及身處的社會結構又在個人身上烙印何種痕跡，左右了職業與移動方向？本文首先嘗試從鏡子的家庭背景、社會環境以及國際情勢的轉變，探問將鏡子推向異地的內、外在動能，及其國家意識的萌芽。

高橋鏡子生於山形縣西田川郡鶴岡町舊庄內藩士族出口家，本名「出口きょう」，因體弱多病而改用漢字「鏡子」為名。父親出口長富原仕於鶴岡舊庄內藩酒井家，1888 年鏡子三歲時，受到廢藩置縣的影響，離開舊職赴山形縣南村山郡任瀧山村的戶長（村長）。1897 年，鏡子從高等小學校畢業，翌年（1898）就讀新設的山形市立高等女學校。鏡子進入女學校，仰賴母親的奔走籌措。[5]

鏡子的人格養成深受士族家庭教育影響。幼時即常常從母親處聽聞關於寓意教訓、人情義理的故事、義士的事跡，這也成為鏡子的庭訓。[6]鏡子的母親留心教育，對於兒子，抱持著應成為軍人的期待，鏡子的兩位兄長日後也都步上軍人之途。[7]另一方面，鏡子憧憬成為護士，但母親

5 板垣邦子，〈解説〉，收入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1-2；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1-42；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1966，東京）（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良友會編，財團法人臺灣協會藏），頁 6。

6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19-20。這些故事包括：中將姬的繪卷物、阿古屋姬的傳說、元和三勇士、宮本武藏、赤穗義士等等。鏡子書寫這些她口中所謂的「母親的恩賜」，是為了說明「情操教育」的重要性，我們卻可以從中窺見鏡子自身的成長環境與背景。

7 鏡子回憶長兄出口永吉中學校畢業後擔任小學校教員，因母病，考慮家計，曾想放棄長年來進入士官學校的願望，結果母親從病床起來儼然喝道：「你為何現在說這等懦弱的話？如果要成為學校老師，那麼一開始進師範學校就好了。一心想讓生於武家的你成為軍人，才在困苦中讓你進入中學校的。」顯示舊士族家庭對於子女立身揚名的期待。見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0；〔日〕園田英弘、濱名篤、広田照幸，《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的研究——士族の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頁 63-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不贊同，在親戚的斡旋下，鏡子女學校畢業後，1900 年任職於山形市尋常高等小學校，隔年（1901）轉任母校瀧山小學校教師。[8]

明治維新以後，對不再擁有社會特權、不得不面對職業重組的舊士族階級而言，軍人、教師等職業，是較接近原本武士階級的社會地位與性質——無損武士所培養的「名譽意識」、可以獲得相當的威信和報酬。特別是，對於原本獨佔「武職」的舊士族而言，「軍人」一職和「武士職」之間具有角色和機能上的連續性，更加強了士族投身於此的志向。[9]另一方面，對女性而言，許多士族家庭選擇讓女兒受高等教育，使之具備養活自己的能力。[10]鏡子邁向教師的路途，受到母親的影響，也是身處舊士族家庭環境背景下一個常見的選擇。

執教鞭的鏡子在工作之餘，學習漢文，參加考試，陸續通過正教員、本科正教員的檢定考試。1906 年左右，參加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入學考試落榜，接受兄嫂的資金援助，進入東京本鄉的女子美術學校裁縫科就讀，遊學東京。[11]鏡子參加考試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之後入學的女子美術學校，皆是當時少數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12]對於向來只能在「家

8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60-63；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6。

9 園田英弘、濱名篤、広田照幸，《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的研究》，頁 63-107。

10 〔日〕佐々木啓子，〈伝統的規範から脱却した新中間層の女性たち——戦前期日本における女子高等教育拡大のメカニズム〉，收入〔日〕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機会拡張と社会的相克》（京都：昭和堂，2008），頁 210-215。

11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77-95、119-121；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6。

12 戰前日本的女子高等教育機關，僅有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女子專門學校兩種體系。從明治到大正期（1868-1926），官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僅有東京、奈良兩所，但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成立於 1908 年，故鏡子參加考試時只有一所「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08 年改稱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即今御茶水女子大學之前身）。民間人士所設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機關，則有 1900 年成立的津田英學塾、東京女醫學校、女子美術學校，以及 1901 年設立的日本女子大學。1900 年代，官方承認的女子專門學校只有 3-4 所，鏡子就讀的女子美術學校在制度上屬於高等女學校畢業後繼續升學的「私立各種學校」，1929 年才依「專門學校令」認可為「女子美術專門學校」。不過，在相關的研究中，皆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制度」慣習中行走人生道路的女性而言，學歷和資格的取得，確保職業地位的同時，也讓「以自己的雙手構築人生」成為可能。另一方面，對取得資格卻未必就業的女性而言，也提供了與社會上層內部通婚的文化資本。[13] 1909 年夏天，女子美術學校在學中的鏡子與二兄長南直次[14]介紹的相親對象高橋壯吉結婚。[15]換言之，婚前的鏡子，獲得一定的知識和能力，擁有可以養活自己的「護身符」，這使她日後人生即便遭逢不遇，也能夠自立。而當有適合的婚配對象，鏡子則選擇離開學校走入家庭。

壯吉任陸軍中尉大隊副官，也是長南直次的同事，同屬秋田聯隊，日俄戰後轉任弘前聯隊。婚後的壯吉勤務之地輾轉朝鮮、秋田等地，之後因身體狀況不佳屢屢缺勤，加上軍事縮編而離職。離開軍職的壯吉，透過親戚的介紹，任職於日本塗漆會社的塗工部，舉家遷往東京。然而，壯吉似乎無法圓融處理問題與人際關係，在工作上不甚順遂。[16]

將之視為 20 世紀初日本女子高等教育萌芽時期的高等教育機關。此外，女子高等教育萌芽的明治末期，高等女學校（中等教育）的畢業生僅有 2-3 成進入「上級的學校」。因此，在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上而言，或就社會文化的意義上，鏡子都可以說是受高等教育。1920 年代以前，女子美術學校以裁縫、技藝為中心，學生過半為裁縫科。〔日〕佐々木啓子，《戦前期女子高等教育の量的拡大過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頁 1-3、16-17、128、183-189；〔日〕天野正子，《女子高等教育の座標》（東京：垣内出版，1986），頁 100-101、186。

13 佐々木啓子，〈伝統的規範から脱却した新中間層の女性たち〉，收入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頁 221；佐々木啓子，《戦前期女子高等教育の量的拡大過程》，頁 225-226。

14 直次入贅親戚家，故兄弟不同姓。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8-31。

15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145-150；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6。

16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03-209、219-222；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6。根據鏡子的說法，壯吉「不會將過錯轉嫁他人，不會說謊」，必要之時也無法面對長上給予「體面的回答」。見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46-2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20 年，受到蒙古產業公司的總辦薄益三（1879-1940）[17]的邀請，鏡子和壯吉以蒙古產業公司社員的身分，前往內蒙古大巴林旗大板上。何以辭去原工作前往蒙古，推測是工作不順遂下的選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邀請高橋夫婦前往蒙古的薄益三，是高橋壯吉父親劍道的門人。[18]高橋的入蒙，可謂仰賴丈夫親族所延伸的人際資源。

前往內蒙古，就日本女性來說，是相當特殊的經歷。《遼東新報》[19]社長大來修治為高橋鏡子的《蒙古の奥から（寄自蒙古內陸）》所寫的〈序〉中提到，前往蒙古的日本婦女有三人，昔有河原操子（1875-1945）、鳥居君子（1881-1959），今有高橋鏡子。[20]

日本從 19 世紀末開始對蒙古產生興趣，曾有許多與陸軍有淵源者、學者、商人、僧侶等，偽裝不同的身分潛入蒙古，學習語言、進行調查、蒐集情報。同時，日本軍人、浪人們與蒙古王公們聯絡往來，展開滲透的活動。[21] 1905 年，在日俄戰爭獲勝的日本，從俄國手上獲得旅順、大連的租借地以及南滿鐵道的利權，成立關東都督府及南滿洲鐵道株式會

17 薄益三，福島縣出身，日俄戰爭之際從軍，於平壤成立薄商會，提供朝鮮駐軍物資。1912 年滿蒙獨立運動（川島速浪擁清皇族肅親王善耆，在部分日本陸軍的支援下策動建立「滿蒙王國」）之時，曾運輸武器。1919 年 11 月，與荒井泰治籌設蒙古產業公司。〔日〕貴志俊彥等編，《二〇世紀滿州歷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頁 38-39、207-208；〔日〕朽木寒三，《馬賊天鬼將軍傳》（東京：德間書店，1981）；朽木寒三，《續・馬賊天鬼將軍傳》（東京：德間書店，1981）。

18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52、170；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6-7。

19 《遼東新報》，1905 年創刊，為大連及滿洲民間發行的報紙中知名度最高且具影響力的報紙。發行之初為週刊，自 1906 年起改為隔日刊，不久再改為日刊，以「滿蒙開發」為其理想。1927 年被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發行的《滿洲日日新聞》併購。參見李相哲，《満州における日本人経営新聞の歴史》（東京：凱風社，2000），頁 48-62。

20 〔日〕大來修治，〈序〉，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東京：庚申堂，1922），頁 7-8。為了閱讀與行文方便，在正文中，高橋鏡子的著作第一次出現時，以「原文（中譯）」的方式書寫，之後逕以中譯表示。

21 金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4-6。

政治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將勢力擴展至中國東北地方和內蒙古。「滿蒙」這個新的地理名詞也在此一時期出現，日本開始策劃「滿蒙政策」。1907 年的《日俄協約》，日本承認「北滿」和「外蒙」為俄國的勢力範圍，俄國承認朝鮮和「南滿」為日本的勢力範圍。[22]

河原操子和鳥居君子的入蒙即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中。河原操子，1875 年生於長野縣松本市的士族之家，長野縣立師範學校女子部畢業後，進入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曾因病休學，身體狀況恢復後復學，畢業後取得教職。除了曾任教於鄉里的女學校外，還曾於為教育在日清人子女而開設的橫濱大同學校、上海的務本女學堂任教，擁有特殊的經歷。1903 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舉辦之時，前往參觀的內蒙古喀喇沁王提及欲展開女子教育，操子乃受公使內田康哉（1865-1936）的委託，於同年 12 月前往內蒙古的喀喇沁；直到 1904 年年末，身兼王府開設的毓正女學堂女子教育顧問，同時以總教習的身分指導女學生。以教育顧問身分渡蒙的操子，其實身負秘密任務，蒐集王府內外見聞的俄國相關軍事、政治情報。表面從事女子教育，實質活動又與民族主義牽扯關聯的操子，其足跡之所以遠及蒙古，可以說是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甲午戰後躋身帝國之列的日本，民族主義的火焰正被炙熱地煽動。另一方面，操子也出身武士之家。1883 年到 1892 年曾多次進入蒙古從事調查旅行的軍人福島安正（1852-1919），是河原操子父親河原忠自幼結識的知交，河原忠深受福島安正之影響，這一點恐怕也影響操子的人格養成與移動方向。[23]

繼操子之後前往毓正女學堂擔任總教習的日本女性，是鳥居龍藏（1870-1953）之妻鳥居君子。君子是四國德島人，市原應資之次女，舊士族家庭出身，德島縣立師範學校女子部畢業後，曾擔任尋常小學校的

22 金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頁 3-4。

23 河原操子的父親河原忠，乃信州（松本藩）的漢學者。福島安正為陸軍軍人，1893 年單騎橫越西伯利亞，熟知中國問題，熱心提倡日支提攜論。參照〔日〕山崎朋子，〈蒙古女子教育に尽くした日本女性　河原操子と鳥居きみ子〉，收入氏著，《アジア女性交流史　明治・大正篇》（東京：筑摩書房，1995），頁 64-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訓導。就職義務年限結束後，進入東京上野音樂學校。1898 年，還在學時，因鳥居龍藏之師，也是日本人類學先驅坪井正五郎（1863-1913）的介紹，成為鳥居龍藏之妻。[24] 1906 年年初，為了尋找河原操子的繼任者，時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東洋史學者市村瓚次郎（1864-1947）與漢學者安井小太郎（1858-1938）拜訪鳥居家，詢問是否有推薦者，夫婦兩人隨即自告奮勇前往蒙古。唯當時鳥居龍藏正在撰寫《苗族調查報告》，因而君子先行出發，龍藏較晚入蒙與之會合。君子在蒙古擔任一年的總教習後，因懷孕而回國。之後，帶著出生的長女，親子三人再度前往蒙古，展開兩年的調查旅行，從事土俗學的研究，採集傳說、童謠，1927 年將其成果出版為《土俗学上より観たる蒙古（土俗學上所觀之蒙古）》。[25] 君子的入蒙，不單只是伴隨夫婿，還可以看到其對於學問的興趣。此外，君子將 1906 年 3 月啟程前往蒙古，至同年 5 月這兩個月的見聞，以日記的形式寫作出版《蒙古行》。[26]《蒙古行》的出版及其內容，顯示君子對未知土地的好奇心與冒險心，包含著國情調查兼探險的紀行要素。

鏡子前往蒙古，與操子、君子有著類似的要素與特質。首先，三者皆生於士族之家，受過女子高等教育。此外，當壯吉與鏡子商談蒙古之行時，鏡子想起就讀山形市立高等女學校時代（1900 年左右），地理老師山田すゑ子之言：「日本的殖民地總是娘子軍先行渡航前往，所以殖

24 〔日〕鳥居龍蔵，《ある老学徒の手記》（東京：朝日新聞社，1953），頁 74；〔日〕中薗英助，《鳥居龍蔵伝：アジアを走破した人類学者》（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 94-122。

25 〔日〕鳥居きみ子，《土俗学上より観たる蒙古》（東京：大鐙閣，1927）。根據鳥居龍藏的回憶，市村瓚次郎希望夫婦兩人能前往蒙古，龍藏和君子商量後決定同行。龍藏在此之前足跡已遍及遼東半島、臺灣、北千島、西南中國、沖繩、滿洲等地，且著手東胡族和契丹的研究，因而也樂於有這次調查蒙古的機會。鳥居龍蔵，《ある老学徒の手記》，頁 117-144；山崎朋子，〈蒙古女子教育に尽くした日本女性　河原操子と鳥居きみ子〉，收入氏著，《アジア女性交流史　明治・大正篇》，頁 73-76；中薗英助，《鳥居龍蔵伝：アジアを走破した人類学者》，頁 177-222。

26 鳥居きみ子，《蒙古行》（明治 39 年〔1906〕刊），收入《明治シルクロード探検紀行文集成　第 18 巻》（東京：ゆまに書房，1988）。

民政策才會失敗。必須讓有教養的女子幫助男子不斷地渡航前往海外才行。」[27]河原操子在長野女高任職之時（1909、1910 年左右），也曾認為，向海外發展的日本女性不能只有賣春婦而已。[28]

日本帝國主義達到高峰的 20 世紀初，官方確立女子教育之方針為賢妻良母主義，同時，也有一些論述要求女性在對外的帝國經營上扮演一定的角色。[29]這些論述與想法反映在當時的報刊中。1910 年的報紙曾討論世界各國殖民地和女性的關聯，介紹德國貴婦們組織婦人殖民同盟會，熱心於殖民地經營；法國「殖民協會」獎勵浮浪女性移住殖民地，甚至因殖民地女性不足，強迫其結婚；英國亦有「英國女性移民協會」，協助在殖民母國難以為生的女性移居殖民地。這些報導，反省日本國民不關心殖民地狀況，並主張為了避免統治階層的風俗紊亂，需要優秀婦人的幫助。[30]報章中的輿論期待女性在殖民地經營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鼓勵移動的對象是「篤實的」、能夠在殖民地結婚成家的女性，而不是為統治帶來風俗紊亂、敗壞治安、「墮落的」賣春婦。不斷參照世界各國殖民地經營方式的後進帝國日本，也參照著歐洲帝國中女性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以此為模範，進而影響了當時日本帝國對女性移民的論述。[31]

---

27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4-45、253。這裡「娘子軍」指的是前往殖民地的賣春婦。

28 板垣邦子，〈解説〉，收入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

29 〔日〕加藤千香子，〈「帝国」日本における規範的女性像の形成——同時代の世界との関係から〉，收入〔日〕早川紀代等編，《東アジアの国民国家形成とジェンダー　女性像をめぐって》（東京：青木書店，2007），頁 64-86。

30 新聞內容概要轉引自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頁 241-243。

31 以當時的英國為例，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的女性移民，與英國國內女性職業的專門化相關。在英國國內無法獲得教職的女教師，帝國為他們開啓解決之道。「英國女性移民協會」也大量送出具有教養和道德的中間層女性，鼓勵女性在殖民地成立家庭。在殖民地組織英國人的家庭，具有傳承民族血緣與英國文化的意義，女性移民成為「帝國企劃」的一部分。〔日〕井野瀨久美恵，《大英帝国という経験》（東京：講談社，2007），頁 272-2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述地理教師山田すゑ子的一番話，可以放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中理解。鏡子就讀女學校時代，約當臺灣納入日本版圖後的五年左右，許多賣春婦來到殖民地臺灣。地理教師的發言，與鼓舞前往殖民地開拓的時代潮流重疊，在鏡子面對選擇是否前往蒙古時，成為重要的關鍵力量，堅定其移動的決心。另一方面，卻又可以讀出女性的角色是被放在「輔佐男性」的位置上——即便獎勵女性移動、在殖民地開拓，但這些都不超出「賢妻良母」的框架。

鏡子居留蒙古期間，受到薄益三的鼓舞，將前往蒙古旅途中的見聞寫成〈蒙古の初旅（初旅蒙古）〉，投稿於《遼東新報》。之後，又陸續將大板上的日常生活、自然風景、事件、異民族風俗記錄下來，與投稿於《遼東新報》的紀行文集結成《寄自蒙古內陸》一書，於 1922 年出版。曾前往蒙古的鳥居龍藏和鳥居君子皆為鏡子的書寫了序，從君子的序文可知兩人素未謀面，卻因同樣擁有蒙古經驗而產生共鳴，龍藏則稱此書彷彿大板上種種活動的一大素描，加上記錄了自然山川風土、蒙古人情狀態，因此可以看作是「東蒙古情事」。[32]

明治時期有許多的探險、紀行文，不過多為男性所書寫。鏡子的著作可視為女性在此一時代風氣下的產物與先驅。鳥居君子在《土俗學上所觀之蒙古》的自序中曾提及：「在歐美，因專門研究或興趣從事人類學、土俗學、考古學等的婦人日益增加，我國則尚未達到此一地步。當此之時，此書雖拙劣，但起此動機，得以成為先驅者，實乃吾之幸。」[33]顯見君子注意到歐美帝國女性旅行者的動向。1870 年代到一次世界大戰前的 1914 年左右，許多英國女性旅行者前往亞非各地的英國殖民地以及南美、太平洋島嶼。這些女性旅行者與因結婚、工作前往自治領（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及美國的英國女性移民不同，他們不在當地

32 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69-284。筆者在臺灣與日本未見得 1920-1922 年的《遼東新報》，故高橋鏡子文稿在《遼東新報》上刊載的狀態，尚待日後確認。

33 鳥居きみ子，〈自序〉，《土俗学上より観たる蒙古》，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居，多為單身，出身中上階層以上，對博物學（植物、動物、鳥、貝、化石）充滿關心，在旅行記中記錄發現的異文化。[34]鏡子的記錄、書寫與出版，潛藏了宣傳蒙古現狀讓更多人知曉，以推進開拓的企圖，同時，也與鳥居君子相似，充滿了對未知土地的探險、對他者的記錄，與明治以來海外調查、書寫紀行文的時代風氣相關聯。

鏡子的入蒙比操子、君子晚了十餘年，日蒙情勢已不可同日而語。辛亥革命後，日本和俄國乘中國內部不穩之機，重新分割在滿蒙的勢力範圍。1913 年的《日俄協約》，以北京的經度為界，將內蒙古劃分為東部與西部，相互承認俄國在內蒙西部、日本在內蒙東部的利權。如此一來，內蒙古東部的哲里木盟、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東部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35]鏡子前往的大巴林（巴林右旗）即為昭烏達盟的一旗，屬於日本的勢力範圍。[36]

1915 年，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獲得了南滿及蒙古東部的土地租借權、所有權，並取得自由居住往來、從事各種工商業的利權。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列強的勢力進入亞洲，迫使原有的秩序面臨改變，在民族自決的潮流中，日本不得不調整一直以來的政策，從滲透的、浪人的秘密活動，轉而以「經濟的」、「漸進的」、「和平的」手段鞏固在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的優越地位。此一時期，日本對內蒙古的輸出商品和資本增加，其內容包含鐵路投資、以「合辦公司」的名義經營土地、農畜產品和貿易為主。[37]鏡子前往蒙古正值此一時期，

34 井野瀬久美恵，《大英帝国という経験》，頁 292-297；井野瀬久美恵，《女たちの大英帝国》（東京：講談社，1998）。

35 金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頁 7-8。

36 關於日本在內蒙古勢力範圍的界線，參照〔日〕西川虎次郎，〈南満州及東部内蒙古ノ境界に関スル意見送付ノ件〉（1915.8.1），收入〔日〕栗原健編著，《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頁 353-356。

37「中日合辦」的名義，主要是日本企業出資成立各種公司，是日本資本輸出的主要型態。金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頁 10-14；栗原健編著，《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頁 120-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所任職的「蒙古產業公司」是為數不少的「合辦公司」之一。

蒙古產業公司是 1919 年由荒井泰治（1861-1927）[38]、薄益三、巴林右旗札薩克・札噶爾合資成立的合辦公司，緣於 1918 年札噶爾向荒井泰治借款，其後以「日支親善」名義展開農牧計畫。日本方面出資 50 萬圓，巴林右旗提供土地和不動產作為股份。1920 年 5 月展開業務，將本部置於巴林右旗的大巴林王府（大板上），並於林西、鄭家屯設置支店，通遼、開魯等地設置出張所。蒙古產業公司獲得滿鐵的後援，從事貿易、改良綿羊[39]、水田試作、設立釀酒場與雜貨販賣等事業。此外，也設立診療醫院、兼營教育蒙古人子弟的學堂。[40]

1920 年 4 月，鏡子與壯吉展開前往蒙古的旅途，經由平壤、奉天、

38 荒井泰治，仙台人。明治、大正時期的企業家，曾於日本銀行、鐘淵紡績株式會社、富士紡績株式會社等公司擔任要職。在投資蒙古產業公司之前，發跡於臺灣，是在臺日人政商界中的有力者。1899 年進入橫濱三美路，以三美路商會臺北支店經理之身分渡臺，同年與賀田金三郎等人共同成立臺灣貯蓄銀行，此後活躍於臺灣的企業界。1907 年創立鹽水港製糖會社，並擔任總經理，1910 年成立臺東拓殖合資會社，經營農業開墾、樟腦採收、畜牧、採礦等。1911 年當選宮城縣貴族院議員。〔日〕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 322。〔日〕宮川次郎，《糖業禮讚》（臺北：臺灣糖業研究所，1928），頁 171。關於日本企業在東臺灣的開發，詳見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2004，臺北），頁 79-116；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4，臺北），頁 315-363。

39 綿羊有食用和毛皮的經濟價值，主要產地為滿洲和內蒙古東部。滿鐵為了滿足日本的羊毛需要和產業開發，從大正時代（1912-1926）以來便打著「增進日支間的經濟利益和兩國親善」的旗幟，在滿蒙展開綿羊改良和普及的實驗調查。（〔日〕栃内壬五郎，〈満蒙に於ける羊毛改良事業〉，《満蒙実業彙報》第 34 号〔1919 年 1 月，大連〕，頁 1-4）擁有滿鐵後援的蒙古產業公司，可說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成立。蒙古產業公司在大巴林旗設立種畜場，從滿洲的公主嶺運來優良品種的羊隻與蒙古本土種進行交配，以圖改良綿羊品種。

40 〈蒙古農牧事業関係雑件 第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 門 政治／7 類 国際企業／7 項 農牧及租借」；〈本邦外国間合弁会社関係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3 門 通商／3 類 商業／2 項 会社、組合」。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52-255、277；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6-7；金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頁 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平街、鄭家屯，5 月抵達蒙古。高橋夫婦進入蒙古，正值蒙古產業公司成立，諸般業務起頭之時。壯吉擔任庶務的主事，鏡子擔任學堂教務部的教務。學堂的教育內容主要為日本語，教育對象為大板上附近的蒙古兒童，另外也有一些中國人和朝鮮人。教材使用奉天外國語學校編纂的國語讀本。[41]

只是，此學堂是蒙古產業公司成立之初即設立的，又或者鏡子前往後才逐漸形成學堂的雛形？根據《寄自蒙古內陸》，鏡子最初只是基於「在這個蒙古的曠野移植日本語，百年後的將來，或許會有所收獲」這樣的想法，開始教導前來玩耍的「求知的蒙古人」一些單字、慣用語等簡單的語彙，之後則「更進一步，像寺子屋（私塾）般聚集蒙古人的子女，教導日本的文字」，逐漸變成學堂的形式。[42]若對照蒙古產業公司相關文件，可以推測 1922 年出版的《寄自蒙古內陸》所描述之情形應接近當時狀況。1919 年 9 月薄益三提出的〈東蒙古牧羊企業計畫書〉中，提及綿羊的飼育與改良、水田的經營、貿易、工業等，皆是之後蒙古產業公司所經營的內容，其中未見學堂的構想，學堂似乎不在原先的規劃中。[43]然而，蒙古產業公司開始經營四個月後的 1920 年 9 月，在赤峰的領事北條太洋致信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報告蒙古產業公司的現狀及商討未來是否給予保護與援助，其中便提及公司事業內容包含了「教育支蒙兒童」，且「蒙古兒童的日本語成績頗為良好」，但是否為「學堂」的形式則不明。[44] 1922 年 8 月，薄益三向北條太洋報告蒙古產業公司與東亞勸業株式會社合併，組織變更，在這份文件中，可以明確看到高橋壯

41 薄益三，〈序〉，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頁 11；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54-265；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頁 255；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東京：秀陽社図書出版部，1933），頁 112。

42 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頁 253-254。

43 〈蒙古農牧事業関係雑件 第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 門 政治／7 類 国際企業／7 項 農牧及租借」。

44 〈本邦外国間合弁会社関係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3 門 通商／3 類 商業／2 項 会社、組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在公司擔任庶務主任，鏡子（文件中名為高橋鏡）則為「教務係」囑託。[45]值得注意的是，與壯吉和其他公司成員多為「職員」的身分不同，「囑託」在日文中為非正式的受雇者。從這些文件顯示的變化及鏡子囑託的身分可以推測，鏡子並非正式的員工，學堂應是鏡子無心插柳所成。

在強調為皇國犧牲奉獻之思維益發濃厚的 1930 年代，鏡子於 1933 年出版的《女性の踏破せる滿蒙（女性踏破的滿蒙）》和 1942 年《感激の思ひ出（感激的回想）》書中，回憶蒙古之行，都是以肩負蒙古產業公司教務部的任務前往蒙古的形式書寫，[46]可以看到鏡子時隔多年後回憶過往，重新解釋過去的作為，並賦予新的意義。

歷經了三年的蒙古生活，高橋夫婦於 1923 年返日。自 1922 年年底起至 1923 年 7 月，在赤峰領事屢屢收到中國外交部熱河交涉署的照會，認為蒙古產業公司在非開港地通商，違反《日清通商航海條約》；農牧等事業，也因未取得中國政府的允許，不符合 1915 年簽訂的《關於南滿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被要求撤離。[47]此外，生活不便、成員離散，以及直奉戰爭帶來的動亂和不安，導致蒙古產業公司經營困難，推測是高橋夫婦歸國的原因。[48]

將鏡子推向遙遠蒙古的背後，交織著多重內在、外在的條件與動能。鏡子和約當同時代前往蒙古的河原操子、鳥居君子一樣，生於士族之家，

45 〈本邦外国間合弁会社関係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3 門 通商／3 類 商業／2 項 会社、組合」。另外，筆者曾翻閱《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可以確認當時存在多樣的教育設施，如私塾、義塾、學堂等，但未見得與蒙古產業公司相關的學堂資料。《內蒙古教育志》編委會編，《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5）。

46 高橋鏡子，《女性の踏破せる滿蒙》（東京：日本軍用図書株式会社，1933），頁 110；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54。

47 〈蒙古農牧事業関係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 門 政治／7 類 国際企業／7 項 農牧及租借」。

48 高橋鏡子，〈外蒙の来襲〉、〈林西軍の来叛〉、〈司令官の更迭〉，皆收入氏著，《女性の踏破せる滿蒙》，分別見頁 172-185、185-191、230-238。高橋鏡子，〈ゴールド夫人を送りて〉，《臺灣教育》336 号（1930 年 7 月，臺北），頁 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日本本土接受女子高等教育，學校教育灌輸的潛在意識及其培養的能動性、對未知土地的好奇心與探險心，成為向外移動及外地謀生的內在動能。而日本對蒙古進行政治經濟的擴張、鼓勵女性向外開拓的輿論，丈夫在日本內地不順遂及人際網絡的串連，則鋪陳了前往蒙古的外在動能，讓鏡子邁向與日本帝國勢力圈重疊的第一步。

二、臺灣經驗、國家意識與教育觀的強化

從蒙古回到日本後的高橋夫婦，何以再度將足跡延伸至日本帝國的另一個疆界？殖民地臺灣之於鏡子又提供了何種活動場域？長年的外地經驗與殖民地場域中的活動，又對鏡子的思想、教育觀、國家意識產生何種影響？

（一）前往臺灣

1923 年，回到日本的高橋夫婦寄居在佐倉鏡子的二哥家，過著田園生活，自稱「從蒙古回來的失業者」、「浪人生活」。約當此時，在姬路任憲兵隊長的長兄出口永吉，轉任臺灣憲兵隊長。鏡子的兩位兄長擔心其未來的出路，便慫恿夫婦兩人到臺灣找工作：「反正都遊手好閒，不要衣物、也不要炭薪，就到附近有北投溫泉的臺北來吧，有位安藤元節先生人面很廣，我請他幫忙找工作。」[49]

從這段鏡子的自述，顯示回到日本的夫婦兩人，無法順利就職，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被視為「遊手好閒」的「失業者」。高橋夫婦在帝國中心的日本本土，淪為社會的邊緣者。然而，帝國邊陲的殖民地臺灣卻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謀求一職，且過著「內地式」的生活。鋪起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49 出口永吉任臺灣憲兵隊長的時間為 1923 年 8 月 6 日至 1925 年 8 月 7 日。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87-294；〔日〕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頁 393。

前往臺灣的路徑，則仰賴兄長的人際網絡。1924 年鏡子踏上臺灣的土地時，時任憲兵隊長的長兄前來迎接，並在安藤元節[50]的夫人幫助下，在臺北市御成町（今民生西路以南之中山北路二段一帶）租賃住處。工作則是安藤元節出面至海山郡役所斡旋，謀得板橋小學校的教職，丈夫壯吉同樣是透過安藤元節介紹，至專賣局臺北煙草工場任職。[51]安藤元節與鏡子的兄長屬於「同縣人」，廣義的「同鄉」也為陌生的外地生活構築一定的人際網絡，提供帶領熟悉新環境與適應新生活的協助。[52]在日常生活中，無論參拜神社、郊外遊賞踏青，鏡子經常隨侍兄長身旁。[53]高橋夫婦的渡臺、定居、就職，可以說是以陸軍軍人身分的兄長們為起點，以其擁有的臺灣經驗和在臺灣經營的人際網絡為基礎，在臺生活也與長兄的生活圈多有重疊之處。但除了仰賴兄長經驗與人脈的延伸之外，也必須注意鏡子自身擁有教員的資格及壯吉曾經的軍人身分，相近的社會階層也使得生活圈容易重疊，鏡子的學歷與資格使其得以抓住機會並勝任等內在背景。

---

50 安藤元節為日本合同通信社社長，活躍於日本本土和臺灣的報界，編有《臺灣大觀》（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2）、《南支大觀》（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7）。參考〔日〕豐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頁 73。

51 根據 1924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與 1925 年到 1931 年的《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可以確認，壯吉自 1924 年至 1930 年在專賣局臺北煙草工場任職，身分為雇員。鏡子則從 1925 年至 1930 年為板橋尋常小學校的訓導，1931 年的職員錄中則不見高橋夫婦二人的資料。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頁 7；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98-300；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8。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4）；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5-1931）。儘管高橋夫婦在蒙古任職的蒙古產業公司之出資者荒井泰治與臺灣的關係匪淺，但在鏡子的相關資料中，未見其來臺任職是出於荒井的介紹。

52 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8。關於同鄉、同縣的網絡，參見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 173-217。

53 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頁 9、73、96-1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活躍於殖民地——臺北婦人修養會的參加與臺北女子高等學院的推動

除了穩定的工作和生活，鏡子積極參與在臺日本婦人所組成的團體，並活躍其中。1929 年 2 月，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下設的教化事業獎勵會，在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舉辦三天兩夜的婦人修養講習會。[54]海山郡派代表數人參與，鏡子亦是其中之一。講習會結束之後，與會者以紀念之名，在臺北成立婦人修養會。婦人修養會的發起人乙守玉緒（1889-?），是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的教諭，講習會時與鏡子同寢室，開啟了兩人日後盟友的關係。策劃婦人修養會者，尚有官夫人二十餘名，鏡子自身也參與其中。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課長竹下豐次以指導官的身分出席。[55]當時的新聞報導指稱婦人修養會是由「居住在臺北的婦人」[56]所組成，但實際上其成員是以高官夫人為中心，並且與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關係密切。婦人修養會的前身婦人修養講習會，講師招聘自蓮沼門三所經營的修養團。[57]蓮沼門三的修養團成立於日俄戰爭結束後的 1906

54 〈臺北婦人修養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2 月 17 日（夕刊），第 2 版。

55 參與的成員有：若槻豐子（文教局督學室視學官若槻道隆〔高等官三等二級俸〕夫人）、竹下かつ子（文教局社會課課長竹下豐次〔高等官三等二級俸〕夫人）、三澤田鶴子（臺北高等學校校長三澤糾〔奏任官二等二級俸〕夫人）、淺香秀子（遞信部海事課課長淺香貞次郎〔高等官三等二級俸〕夫人）等。從名單可以窺見成員多為高官夫人。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發起人」只記載為「某位夫人」，但根據鏡子的紀錄，發起人為乙守玉緒。乙守玉緒，1925-1930 年擔任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教諭（判任官三級俸）。乙守回日本後，仍與鏡子保持聯繫，1942 年任職東京聯合婦人會，更運用婦人會的資源，編輯遠在哈爾濱的鏡子手稿，出版《感激の思ひ出》。值得注意的是，鏡子任職板橋小學校的時間，與乙守玉緒任職二高女、三澤糾任職臺北高等學校的時間一致，同為 1925 年至 1930 年。前述人事資料彙整自 1924 年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與 1925 年到 1930 年的《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42-343、417、卷頭寫真；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8。

56 〈堅實な婦人達によつて新しい團體が作られる 「婦人修養會」と名乘つて來月下旬發會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28 日，第 7 版。

57 〈臺北婦人修養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2 月 17 日（夕刊），第 2 版。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年，就讀青山師範學校的蓮沼，從校風、宿舍的美化運動展開，以「流汗鍛練」、「同胞相愛」為根源，基於個人的徹底「修養」，寄予國家、社會的改善與發展。[58]「修養」的思想，一方面關係到自律個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與天皇制國家政策接合，擔任了培養忠良臣民的角色。[59]蓮沼的修養團之成立，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在明治維新後教化概念形成與教化團體紛起的潮流中出現。明治維新後，面對西方文明的移入、啟蒙運動、偏重科學技術的情勢，出現了一連串復古的結社團體，試圖讓儒教道德復活，透過家族主義倫理的整編，強化國家的統制，養成順從的國民，形成天皇制國家的意識形態。1890 年〈教育敕語〉的頒布，便是在啟蒙與復古的論爭中，以儒教為中心，強調天皇的神聖不可侵犯；1908 年的〈戊申詔書〉更是強調勤勞、忍耐、忠誠等德目，以戒人心的輕佻浮華。諸多的教化團體即以這些傳統的倫理、道德為修養教育基礎，發揮教化民眾的功能。[60] 1906 年成立的修養團，也宣言要「讓一貫親和且持續努力的皇國魂高漲」，1920 年代之後，逐漸被導入國家的教化政策之中，與國民精神振興運動結合。[61]

1929 年成立的臺北婦人修養會強調「相愛流汗」，繼承了蓮沼門三修養團的標語「愛與汗」，此外，也規定會員必須加入修養團。臺北婦

58 〔日〕松村憲一，〈近代日本の教化政策と「修養」概念——蓮沼門三の「修養団」活動——〉，《社会科学討究》第 19 巻第 1 號（1973 年 12 月，東京），頁 14-17；〔日〕綱沢満昭，〈蓮沼門三について〉，《近畿大学教養学部紀要》第 29 巻第 2 號（1997 年 12 月，東大阪），頁 118。

59 關於近代日本「修養」思想的討論，參見〔日〕瀬川大，〈「修養」研究の現在〉，《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教育学研究室　研究室紀要》第 31 号（2005，東京），頁 47-53。

60 松村憲一，〈近代日本の教化政策と「修養」概念〉，《社会科学討究》第 19 巻第 1 號，頁 1-6；綱沢満昭，〈蓮沼門三について〉，《近畿大学教養学部紀要》第 29 巻第 2 號，頁 117。

61 臺灣、滿洲之後也出現這樣的發展。1932 年滿洲國的新京建立修養團會館，以促進日滿提攜、五族協和之實踐。松村憲一，〈近代日本の教化政策と「修養」概念〉，《社会科学討究》第 19 巻第 1 號，頁 16-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修養會發起人乙守玉緒在創立之初提到：「自覺婦人之本分」、「脫卻身分、地位這些形式，藉由相愛、流汗，讓心和心吻合合體，所有的親和、所有的努力，藉由會員之手實現，讓本島的精神界更加明亮」。[62]婦人修養會的活動內容，包含每月一次的講演、懇談、協議、研究發表、唱歌、遊戲、國民體操、美化運動、娛樂餘興等；歲末年終則舉辦搗年糕、寄贈衣物與金錢給社會事業團體、國防獻金、貧民救濟活動、演奏會等活動，兼具親睦與社會救濟的性質。[63]

若觀照日本本土婦人團體的情況，在日俄戰爭後推行的地方改良運動中，內務省獎勵婦人會的組織化，及至 1920 年，未婚女性所組成的處女會與無年齡限制的婦人會分布各個都道府縣，超過上百團體，亦有少數名為修養會者。這些婦人會的主要活動為舉辦演講、講習、講話會及研究會，其內容多與農村經濟、家庭生活之改善相關。[64]另外，發行《婦

62 〈堅實な婦人達によつて新しい團體が作られる 「婦人修養會」と名乘つて來月下旬發會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28 日，第 7 版。

63 整理《臺灣日日新報》歷年與婦人修養會相關的報導及鏡子的記述可以發現，初期的活動與教化、社會救助事業關係較密切，進入戰爭時期之後，也舉辦時局談、慰問會、國防捐獻、寄贈慰問袋等。主要活動場所在第一高等女學校、第二高等女學校、鐵道旅館、曹洞宗別院，晚期則多在濟美會館、教育會館。1929 年至 1932 年之間，活動的準備以視學官若槻道隆在文武町的官舍為據點，若槻轉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長後，則轉移至東門町海事課長淺香貞次郎的住宅。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頁 275-280；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04-411。〈堅實な婦人達によつて新しい團體が作られる 「婦人修養會」と名乘つて來月下旬發會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28 日，第 7 版。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1929 年分），頁 44。

64〔日〕渡邊洋子，《近代日本女子社会教育成立史——処女会の全国組織化と指導思想》（東京：明石書店，1997），頁 56-72；內務省社会局編，《全国処女会婦人会の概況》（東京：內務省社会局，1921）。順帶一提，1920 年代以來內務省推動的農村婦人會的組織化，更為 1930 年成立的大日本聯合婦人會奠定基礎。町村婦人會、統合的郡聯合婦人會、都道府縣聯合婦人會，由下而上形成一大體系，大日本聯合婦人會成為政府體系下最大規模的婦人組織。其事業內容強調「修養」與「奉仕」，修養涵蓋「智德體情」四個分野的「普遍之修養」，以「婦德的涵養」、「分擔的擴充」、「婦人地位之向上」為目的，「奉仕」的內容為「自己、家族、社會、國家及自然，盡自己的責任」。滿洲

女界》雜誌的婦女界社，亦於 1913 年成立「大日本婦人修養會」，會員分布各個都道府縣。該組織是由讀書出發，以婦人的修養為宗旨，強調在日常生活培養美德，偏重內在的修養；討論內容涵蓋個人的生死、道德觀、家庭關係，以及世界與社會樣貌等。[65]可見臺北婦人修養會與日本的婦人會在活動的形式與內容上，有共通之處，唯臺北婦人修養會是以都市的中上層女性為對象，並且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指導，其體系承自蓮沼門三的修養團。從成立的時間、與修養團的關係、發起人的言論，以及活動的內容，顯示婦人修養會的成立與時局相關，被納入教化運動的一環，而女性也肩負殖民地教化的任務。

鏡子自身在回顧婦人修養會的誕生時，提到成立的目的在於深感「身為教育者的母親，教養如何重要」；其對於婦人修養會之目的的理解，在於婦人自身的教養，以成為擁有足夠修養、有能力教育下一代的母親之角色，而其最終目的是為國家盡作為女性之力。鏡子並附錄了該會成立宗旨，節錄如下：

> 當此重大之秋，我等婦人該如何為國家奉獻。若只是閉居家庭之中，困於自身之事，容易失去對寬廣世間的關心，從而無法充分盡我等之義務，我等的日常生活態度、經濟生活的標準、青年子弟的思想善導、對社會生活的奉獻等，只靠我等個人的努力無論如何都不充分的時代已來臨。我等若同心相量、相助、衷心相語、相祈，合力、分享智慧，相信更能盡婦人與家庭之力，因而企劃此次同志的團結集合。請在我等家庭婦人之中鼓動力量，深切期待為了國家的將

事變後，隨著時局的推移，「奉仕」更優先於「修養」，以「奉仕」為根柢，強調「犧牲的精神」。參見〔日〕千野陽一，《近代日本婦人教育史——体制内婦人団体の形成過程を中心に》（東京：ドメス出版，1979），頁 250-273；大日本聯合婦人會，《系統婦人の指導と経営》（東京：大日本聯合婦人會，1935）。

65 大日本婦人修養會具有相當的規模與組織，並提供獎學金，在福岡、大阪、兵庫、北海道、長野、廣島、京都、岡山、神奈川、愛知、支那（中國）、新瀉、島根、熊本、朝鮮、桑港（舊金山）等地設有支部，會員總數近 4,000 人。婦人修養會編，《婦人修養の栞》（東京：婦女界社，1923）。

臺灣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成為一種愛的力量。[66]

從鏡子的回顧與該會宗旨可以窺見，從個人自身的修養出發，除了傳統家庭教育中母親扮演的角色外，更進而組織社會團體，最後連結至「為國家盡婦人之力」。換言之，婦人修養會描繪了一種形象，讓在家中扮演母職、教育子女的女性角色，延伸至社會、國家；同時，修養會本身也成為一座橋樑，讓女性從私領域的家庭，走入公領域的社會、國家。反過來說，女性在國家、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依然是傳統家庭中「教育子女」的延伸。

1930 年，臺北婦人修養會欲在臺北設立女子高等教育機關，作為其事業的一環，展開向總督府請願的活動。這項運動的背景與在臺日本人社會的需求密切相關，隨著在臺人士的定居、女學校畢業生增加，女子高等教育之需求應運而生。請願運動的核心人物是鏡子和乙守玉緒，二人發表〈女子専門校の設立と母親の願ひ（女子專門學校的設立與母親的願望）〉，從在臺日本人集團的利益出發，疾呼女子專門學校設置的必要性。[67]事實上，這項請願運動是官方策動既有民意而產生的具體行動，請願人士與官僚之間存在著人脈關係。具體而言，總督府內部對女子高等教育的意見分歧，新上任的文教局長杉本良（1887-?）為壓制內部異議，乃與婦人修養會合作，進而動員民意。[68]鏡子回憶道：「由於

66 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頁 271-275。

67 女學校畢業生日漸增加，卻無升學管道，在臺日人為了解決畢業生必須遠赴日本升學的問題，以及受到日本本土各都市興起設置女子專門學校風潮之影響，以臺北婦人修養會為中心發起請願活動。洪郁如，〈女子高等教育の植民地的展開——私立台北女子高等学院を中心に〉，收入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頁 84-89。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台灣學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 162-185。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78；高橋鏡子、乙守玉緒，〈女子專門校の設立と母親の願ひ〉，《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5 月 31 日（夕刊），第 3 版。

68 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台灣學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杉本文教局長的提案，認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應盡可能把教育程度提升到接近男子，故計畫在臺北設置女子高等學院。這件事經與婦人修養會商量，大家都欣然贊成，表示願意盡力協助。」[69]

一年後的 1931 年，臺灣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機關「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誕生，由臺灣教育會經營，[70]總督府提供補助。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成立後，鏡子受到學院成立之際扮演重要角色、也是第一任校長杉本良的招聘，從板橋小學校轉任該學院，擔任舍監和事務員。[71]

從加入婦人修養會、與高官夫人們往來，積極參與修養會相關活動，以至後述撰寫與修養、女子教育相關的文章，在在顯示鏡子作為一位中間層女性的主動性，受社會結構與時代潮流的制約，但同時也乘著時代之風，積極求取自我實現，進而接近統治階層，活躍於殖民地在臺日人的上層社會。

（三）國家意識與教育觀的強化——日本帝國中女性的角色

透過教育經驗的累積、婦人修養會的積極參與，在臺居住的八年，是鏡子對自身定位以及教育觀強化的時期。以下嘗試從鏡子的著作和發表的文章，追探其國家意識與教育觀變化的軌跡。

1922 年出版的《寄自蒙古內陸》，主要記錄蒙古的風俗、自然風土，行文之間不斷流露一種作為「文明者」的視線，然而，關於國家意識和教育觀並不明確。在旅途中，雖然有感而道：「活躍於遙遠的蒙古曠野，

集》，頁 163-165。

69 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8-9。

70 臺灣教育會於 1901 年成立，前身為 1898 年臺北教育界人士成立的國語研究會。該會除研究日語外，以圖謀臺灣教育之普及與改進為宗旨。

71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82-387；〈臺北女子高等學院紀事〉，《臺灣教育》346 號（1931 年 5 月，臺北），頁 90-95。關於女子高等學院設立的背景、經緯、經費來源及其意義等，洪郁如已有詳細的討論，參見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台灣學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頁 157-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感覺是為了皇國，留下武士道的一部分」，但對於開學堂，並未有明確的想法，只是模糊地認為「在此蒙古曠野移植日本語，百年後的將來，或許會有所收穫」。[72]雖然提及「為了皇國」，也曾在書中描述在蒙古迎接天長節，「在異地國民的赤誠不變」、「皇國的御稜威遠及興安嶺」，[73]但並無其他更多、更明確的闡述。

1933 年出版的《女性踏破的滿蒙》和《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映在女性眼中的蓬萊之島）》，國家意識和教育觀念逐漸具體明白。對於教育，明確地揭示其想法：「國家百年之計在於教育」，教育的目的在於養成「為國家著想的國民」。[74]在國家意識上，認為「我國諸德中最重要的是以『忠』字為根源」，也開始出現論述物資節約、子女教育使命、國防獻金等是「為了國家」、「神國的建設」等篇章。[75]

1942 年的《感激的回想》，更認為自己入蒙的動機與使命在於教育蒙古人子弟和促進日蒙親善，並將蒙古產業公司的事業解釋為「八紘一宇的準備」。對於到板橋小學校任職，則視為再次投身教育界的開端：「若要在蒙古完成殖民政策，必須從國民教育重新開始，培養出更偉大的人才行」。自認來到臺灣的理想，在於「培養出能夠繼承自己理想的國民」。[76]此外，全書充滿了「敬神崇祖」、「滅私奉公」的觀念，對於自己人生中的遭遇，也經常以神恩、皇恩解釋，反映了以皇室為頂點的家族國家觀。

這些敘述的變化，顯示鏡子逐漸傾向以皇室為頂點、「為國家犧牲個人」，並重新連結過去和現在的所作所為，對這些行為做出解釋、賦予意義，同時，定義自己在整個帝國空間中的位置與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鏡子來到臺灣是 1924 年，國家意識和教育觀明顯增

72 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頁 253-254、187。
73 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頁 101-104。
74 高橋鏡子，《女性の踏破せる満蒙》，頁 110；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莱ヶ島》，頁 142、240。
75 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莱ヶ島》，頁 136、248、263。
76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265-266、277、300-3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強的文章，皆發表於 1929 年以後。除了前述四本著作之外，投稿於雜誌的文章更清晰可辨這樣的痕跡。根據筆者目前搜集的資料，鏡子在臺期間（1924-1932），共發表了 10 篇文章在雜誌上，皆在 1929 年到 1932 年之間。[77]在這些文章中，鏡子主要關注的主題大抵集中在人格教養、國家觀念的養成、勤勞教育、鼓吹開拓、女性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與婦人修養會強調的觀念多有重複。有時上述不同主題也並存於一篇文章中。

以〈国家的目標と勇気（國家的目標與勇氣）〉一文為例，該文強調國家觀念的覺醒，擁有小孩的女性，應成為「內助之賢母」，將兒子培養成可以「為君國獻身」者。而要成為一位賢母的準備，首先應致力於自我的修養，在實踐上，除了重視勤勞之外，還要注意世界的動向和日本的現狀，時時參照新的世界進展，勞心費力於未來國家的建設；並主張婦人的使命在於子女教育，為國家培養忠良的臣民，增進「國家的富力」，圖謀「國力的充實」。[78]在這篇論述中，鏡子從個人的修養出發，並將女性定位為「內助之賢母」，強調修養、勤勞、女性的力量、國家觀念。這些論調，清晰可辨婦人修養會所提倡的精神與論述。

---

77 將高橋鏡子這些文章依時間順序羅列如下：〈朝起き〉，《宇宙的心》1929 年 2 月号（臺北），頁 22-24；〈春の満州名物〉，《宇宙的心》1929 年 4 月号（臺北），頁 37-39；〈国家的目標と勇気〉，《宇宙的心》1929 年 6 月号（臺北），頁 28-31；〈小原先生に就いての感想〉，《第一教育》第 8 卷 11 号（1929 年 12 月，臺北），頁 36-38；〈雛祭について〉，《社会事業の友》第 16 号（1930 年 3 月，臺北），頁 52-56；〈ゴールド夫人を送りて〉，《臺灣教育》336 号，頁 98-102；〈補充すべき修身教材に就て〉，《臺灣教育》339 号（1930 年 10 月，臺北），頁 30-33；〈社会の罪〉，《社会事業の友》第 26 号（1931 年 1 月，臺北），頁 33-35；〈教育家としての母〉，《臺灣教育》355 号（1932 年 2 月，臺北），頁 130-131；〈修身科の採点に就いて〉，《臺灣教育》359 号（1932 年 6 月，臺北），頁 41-44。投稿的雜誌集中在《臺灣教育》（4 篇）、《第一教育》（1 篇）、《宇宙的心》（3 篇）、《社會事業の友》（2 篇）。其中，投稿篇數最多的《臺灣教育》為月刊，由臺灣教育會創辦。117 號（1912 年）起，雜誌名稱由《臺灣教育會雜誌》改稱《臺灣教育》，發行至 1942 年 485 期。次多的《宇宙的心》，則是由赤誠會所發行。赤誠會以尊重國體、振作國民精神為目的，強調思想善導。

78 高橋鏡子，〈国家的目標と勇気〉，《宇宙的心》1929 年 6 月号，頁 28-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人注目的是，無論自我的修養或子女教育，其外緣的目的是國家，「內助」的角色也並不止於家庭之中，而是藉由培養為國獻身的子女，進而連結社會、國家。事實上，無論何種主題，鏡子文章論述最終的連結對象，往往是「國家」。討論修身教材之文章中，鏡子著眼於作為一位「日本國民」、「世界人」、「社會人」、「家庭人」，展開如何培養道德觀、國民觀的討論，認為應有足夠的世界知識和國家觀念的根柢，才能養成「愛國的國民」，甚至重視軍備擴充、介紹法西斯式的國民教育和軍隊教育。[79]關於勤勞教育的議題，則認為可藉以矯正不事生產等國民性的缺陷。[80]鏡子論述的邏輯幾乎與修養團寄予國家、社會之發展的目標重疊，甚至更激進，視線更向外延伸，國家之外的「世界之動向」、「世界之進展」也是其關照的視野。

這些論述的軌跡顯示，鏡子的思想、意識之變化，加入婦人修養會的 1929 年，是明顯的轉捩點。修養團的標語「愛與汗」、婦人修養會強調的「為國家設想的純情」、「母性的教養」、「藉由母性的力量讓國家觀念生根移植」等想法，[81]在鏡子發表的文章中處處可見其影子。

婦人修養會還扮演了媒介的角色，讓鏡子有機會接觸更多相關的主張與言論。1929 年，鏡子因總督府社會課的派遣，以臺灣代表的身分，參加全關西婦人聯合會所主辦的「全日本婦人經濟大會」。[82]比起其他

79 高橋鏡子，〈補充すべき修身教材に就て〉，《臺灣教育》339 号，頁 30-33。

80 高橋鏡子，〈小原先生に就いての感想〉，《第一教育》第 8 巻 11 号，頁 36-38。

81 例如，1929 年 6 月 16 日臺北婦人修養會第三回例會中，第二高等女學校校長鈴木讓三郎提到婦人修養會的設立是「從懷想國家的純情出發」，關於女子教育則表示：「女性潛藏偉大的力量、尊貴的心，充分發揮這項教養，即母性的教養，並且以國家觀念為德性的中心來涵養，讓自己為國家勞動，同時侍夫教子，讓國家的觀念藉由母性的力量生根移植。」〔日〕鈴木讓三郎，〈昭和大御代と日本女子〉，《臺灣警察協会雑誌》145 号（1929 年 7 月，臺北），頁 209-214。

82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66-370。〈経済国難に直面して救国の雄叫びをあげた全日本婦人経済大会〉，《婦人》第 6 巻第 10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收入〔日〕鈴木裕子編，《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　第 2 巻　思想·政治》（東京：不二出版，1996），頁 167-18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參加者，當時的鏡子對於國家、節約等政策的相關議題並未抱持清楚的想法。[83]然而，會議中訴求、提倡的消費節約、愛國儲蓄等相關討論卻在日後鏡子的著作《映在女性眼中的蓬萊之島》中出現，影響了鏡子的論述。[84]從文章發表的時間點和內容可知，加入婦人修養會的 1929 年到 1932 年返回日本之前的三年間，是鏡子思想產生變化的重要階段。

鏡子的許多論述，看似只沿襲了修養團、婦人修養會的言論，卻不可忽視鏡子自身移動經驗的影響。女性在整個國家之中，以及在移殖民的開拓上，應扮演何種角色，是鏡子最為關注，且擁有自己具體看法的部分。

對於移殖民問題，鏡子基於自身蒙古經驗的反省，感嘆日本人缺乏國民的教養和移住開拓的信念。回顧蒙古經驗時寫道，當初一同前往蒙古的日本人紛紛離去，「我開始對於未來國民教養懷有深切的信念」，「當時，恰好遇見比利時的傳教士默默立於荒野盡頭，默默地活躍著……，我因為此人而得到更深的暗示與教訓，領悟到大正以後的國民教育之一部分必須加入這個項目。」鏡子認為「不離鄉土是一種驕傲」這樣的想法，會阻礙移民的發展，並以堅毅的婦女作為典範，思考愛國心與移民發展之間的關係。[85]

之後鏡子的言論更進而超越「良妻賢母」的框架。1930 年發表〈雛祭について（關於雛祭）〉一文，認為「皇室中心主義的深厚根源」在

83 在整場會議中，鏡子只有如下發言：「我想以贊成的態度，提倡勵行早起。在臺灣妨礙早起的是麻將的流行，特別是中層以上的人特別多。我認為麻將是亡國的遊戲，沒有其他代替麻將的遊戲嗎？」〈経済国難に直面して救国の雄叫びをあげた全日本婦人経済大会〉，收入鈴木裕子編，《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　第 2 巻　思想・政治》，頁 167-180。

84 如檢討婦人服裝費過高、雇用女傭等現象對國家與家庭經濟不利。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莱ヶ島》，頁 132-136、243-249。

85 高橋鏡子，〈ゴールド夫人を送りて〉，《臺灣教育》336 號，頁 98-102。實際上，鏡子在《蒙古の奥から》（1922）中，也曾提到「比利時人的教堂」，但並未陳述上述的感想。但是，離開蒙古十年後的 1933 年，鏡子認為，蒙古子弟的教育是「深入蒙古的一個紀念塔」。（高橋鏡子，《女性の踏破せる満蒙》，頁 261-264）顯示鏡子的蒙古經驗隨著時間而發酵，重新被定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雛祭所表現出來的「我國女性的尊貴」，強調應對女性施予「能培養真正母性愛、國家愛」的「特種教育」，並鼓吹勞動和海外發展：

> 尊崇無形的纏足，急於培養良妻賢母的結果，便是留下無法收回昭和世界版圖的遺憾，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件事。鎖國之禁解除後，有抱著青雲之氣欲雄飛海外的男子，但婦人卻固守家中，對世界毫無理解，只有可憎的娘子軍與這些男子為伍向外拓展，其結果便是摘除了向海外發展的嫩芽，在此必須反省改善找出目標。[86]

這段論述，顯示鏡子的女子教育觀已不安於「良妻賢母」主義，認為婦女不應只是固守家中，應對世界有所理解，甚至抱持著女性也應向外開拓的想法。這樣的主張受到蒙古和臺灣經驗的影響，也可以說是鏡子顯著的特色。

1931 年受邀擔任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舍監的鏡子，對女子教育的看法更形具體，且有別於當時的社會輿論和官方看法。女子高等學院從設立之初到其後的經營過程，其教育理念及方針不斷在職業教育與賢妻良母的教養間搖擺不定。第一任校長杉本良任職一月半（1931.4- 1931.5）後辭職歸返日本。1931 年 9 月起接任校長的吉川貞次郎（1875-?）主張以賢妻良母之教養為主，不施以職業教育。對於學院自成立以來不斷將教育理念轉向賢妻良母之新娘學校教育，《臺灣日日新報》的輿論以及日人家長皆持反對的態度。日人女學生多為官僚家庭出身，近代日本公務階層又以舊士族出身為主，熱衷於資格取得，因此日人家長多期待該校升格為女子專門學校，施行職業教育，畢業生能取得中等教員資格，以備將來不時之需。[87]

---

86 高橋鏡子，〈雛祭について〉，《社会事業の友》第 16 号，頁 52-56。

87 賢妻良母式的新娘教育與職業教育兩者的路線之爭，攸關女子高等學院升格專門學校及畢業生是否擁有教員資格的問題。詳細的討論見：洪郁如，〈女子高等教育の植民地的展開〉，收入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頁 95-102；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台灣學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頁 169-1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2 年 2 月，身為舍監的鏡子以「臺北婦人修養會會員」的身分，在《臺灣教育》雜誌上發表〈教育家としての母（身為教育家的母親）〉一文。這篇文章發表的時間點為吉川貞次郎接替杉本良就任校長的半年後。鏡子開宗明義便寫道：「產出更多賢明的母親，是國家強盛的根本。」她認為過去的女子教育目標在於「作為女性、作為國民，應接受相應於時代文化的教育，以嫁給擁有受相當文化教育的男子」；而現下普遍認為，女子教育的目的往往是為了「獲得職業，為了家庭，以及將來預防萬一」。顯見鏡子對話的對象，是期待施行職業教育以備將來之需的社會輿論，以及主張完全以賢妻良母教育為主的新校長吉川貞次郎。鏡子並非排斥過去的良妻賢母主義，且認為所謂「武士之母」的家庭教育也是重要的，但她主張應在「精神上」和「科學上」都必須投注心力，以完備母親作為教育者的責任，這是為未來國家強盛出力的方式。所謂的「精神」包含傳統的精神文化、師法天地自然的自我教育，以及寓於繪畫、遊戲、音樂、演劇等藝術的情操教育。所謂「科學」，指的是母親作為物質文明的指導者、教育者，面對疑問，能夠學術性地回答，擁有物質文化建設的預備智識之寶庫，為立足於未來的科學戰場做準備。[88]

這篇文章顯示鏡子在思考女子教育之時，包含了兩個面向：精神上的人格養成與智識上的知識學問。相對於當時的輿論，她承襲了賢妻良母主義，卻又不囿於家庭，而是更延伸至國家層次的思考。對鏡子而言，女子教育是放在國家強盛的軸線上思考，女子教育不是為了個人的出身立世或謀得一職，而是為了可以成為賢明母親。賢明的母親攸關傳統家庭教育中子女的教養，同時，也必須擁有世界潮流中的科學文化相關知識。這一切都指向下一代的教養，也指向國家的強盛。女性作為母親，是培養子女以強國的重要推手。

事實上，鏡子的想法和邀請她到該學院擔任舍監的第一任校長杉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8 鏡子以歐美的婦女為例，在公園可以為小孩說明蘚苔的孢子，在博物館可以說明機械運轉的原理，強調科學知識之於母親的重要性。高橋鏡子，〈教育家としての母〉，《臺灣教育》355 号，頁 130-131。

良之間也存在著差異。杉本良回顧學院創立時，其理念是「不滿足於新娘學校，即便同為新娘，也不是裝飾的「雛樣」（女兒節的娃娃），而是能搭配臺北帝大出身男子諸學士，能作為優秀賢內助的新娘」，為達到這樣的目標，「不囿於因襲、舊弊，亦即應有國際化的素養。不厭惡家務，除了育兒、料理、裁縫外，為了家庭和樂，也應學習家庭音樂」。可以看到在現代化、國際化的面向上，鏡子與杉本良有著相似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則顯見鏡子極度強調國家的面向，與杉本有別。[89]

綜上所述，1924 年渡臺的鏡子，發表的文章卻皆集中於 1929 年至 1932 年之間，其內容與婦人修養會強調的觀念多有重複，且圍繞著與「國家」的關係打轉，這一點可以從鏡子參與婦人修養會以及與整個社會教化運動間的關係來理解。但另一方面，基於自身的經驗，鏡子也逐漸顯露、發展出個人的詮釋。

以天皇為頂點的忠誠心、向海外開拓的國家意識，這些想法的萌芽，與舊士族家庭出身的背景、擁有身為軍人的兄長、丈夫，以及以此為中心展開的親戚和人際關係密切關聯。此外，對鏡子人格養成影響至鉅的高等小學校、女學校時代，恰好是日本獲得第一個殖民地臺灣之時，是熱衷於向海外擴展、國家意識昂揚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風潮中接受學校教育，影響了鏡子的國家意識。但其意識並非一開始即明確清晰，在臺灣參與活動所築起的人際資源、自身投入社會教化運動，以及蒙古經驗日後的發酵，在在牽動了鏡子的思想與行動，也強化了其養成「忠良臣民」的教育觀和向外開拓的國家意識。受到時代潮流與官方思想影響的鏡子，在向外移動與擁有殖民地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將這些思想內化並實踐，甚至透過書寫，成為積極推動、散播言論思想的一員。時代形塑了鏡子的思想、牽引了其移動，而鏡子也推動了向外擴張的時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9 〔日〕杉本良，〈ご挨拶〉，《良友》期號不明（1985，東京）（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良友會編，財團法人臺灣協會藏），頁 4。

（四）殖民地場域中的自我實現
——從帝國的中心到邊陲／從社會的邊緣到中心

在臺灣的鏡子，除了以學校為活動往來中心之外，也展開、建立自己的人脈網絡，一面與官夫人們交際往來，一面活躍於社會教化活動。在臺灣參與活動所築起的人際資源，也牽動了其後的人生方向與際遇。

1929 年 4 月，在臺北婦人修養會的成立大會上，鏡子擔任會議主持。對於這項任務，鏡子自述道：「庄內藩呱呱墜地四十年，至此得以擔任這份殊榮，這一天的到來，我是多麼地誠惶誠恐。」[90]鏡子在殖民地臺灣獲得了自我實現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是在日本本土所無法企及的。

加入婦人修養會，在團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達官、顯貴夫人們交際往來，對鏡子而言是生涯中重要的開展。這項開展更帶來其他的機會。前述鏡子之所以能以臺灣代表身分參加「全日本婦人經濟大會」，是因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的派遣；推動臺北女子高等學院的設置請願，亦是受到文教局長杉本良及婦人修養會的發起人乙守玉緒之影響。換言之，參加婦人修養會所獲得的人際資源，帶給鏡子許多機會。從鏡子的經歷、著作、言論、在臺灣活躍的身影顯示，於在臺日本人社會中，鏡子的社會地位在中上以上，甚至是接近統治階層的。不過，若從其向外移動的經緯來看，儘管出身士族之家，擁有相當的學歷，屬於社會的中間層，但由於丈夫工作的不順遂，必須向外尋求可能性，可以說是被日本社會排除的、中間層中的邊緣者。

不遇的心境、流向帝國邊陬之地、邊陲的美好，這些交織著複雜的心理與矛盾之情也顯現在其敘述當中。返日後的鏡子撰寫《映在女性眼中的蓬萊之島》一書，描寫在臺生活，也具有介紹臺灣的意圖。書中鏡子不斷以標示文明、權力的地景來描繪臺北的風景，強調「周緣的外地」絕不劣於「中心的內地」。然而，時而不小心流露本意的字句，如：「若居住於臺北市，將享受更勝於東京郊外的文化設施，過著漂亮的內地延

90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48。

長生活」，又顯示在鏡子心中，居住的臺北，畢竟不是文明中心的「內地」，而是「邊陲的中心地」，呈現複雜矛盾的心境。[91]又如，提及板橋小學校學生們通學不便時，有感而發：「身處於不遇的邊陬之地，人心不斷被磨練著」，[92]儘管寫的是學童之事，反映的卻是自身的心境。在殖民地臺灣社會，鏡子的位置靠近統治階級，然而從日本帝國空間來看，則潛藏其身處邊陲位置之面向。

1932 年鏡子離開居住八年的臺灣回到日本，離臺主因是人事變動導致處境艱難。以天皇為頂點，懷抱敬神、愛國思想的鏡子，原本就與當時女子學院自由活潑的風氣有些隔閡。[93]因文教局長杉本良的關係而進入女子學院的鏡子，和同僚之間也存在著摩擦。[94] 1931 年總督更迭，杉本良辭職返日，鏡子更加難以留在該職位上，隔年便回到日本本土。[95]儘管因失意才返回日本，回首在臺灣八年活躍的社會生活，鏡子稱這段時期為人生的「黃金時代」。

綜觀這些經歷，我們可以說：原本身處日本社會中間層邊陲位置的

---

91 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萊ヶ島》，頁 19-26。關於鏡子所描繪的臺北意象及其反映的心境，參見顏杏如，〈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9），第三章「語られた台北——植民地都市空間の心象風景」，頁 108-143。

92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10。

93 女子高等學院的學風，從鏡子眼裡看來，「過著放縱的殖民地家庭生活，缺乏『謹慎謙恭』的生徒佔了超過半數」、「喪失日本女性的氣質、花蝴蝶般、膚淺的、殖民地型者佔絕大勢力。對長者充滿反抗氣氛，對於難以進展的思想傾向，我感到棘手」。因此，擔任舍監的鏡子，「剛到學校宿舍時，第一件事是捧持著奉安天照皇太神宮和臺灣神社護符的神殿前往，安置神棚」。此處的「神殿」指仿造的小型神社。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94、398、142。

94 鏡子自述道：「學院中有眾多的公婆、小姑。因局長好意而在那裡工作的我，被投以忌妒之眼。」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89。

95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87-393；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台灣學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頁 165；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鏡子，移動至日本帝國空間中邊陲位置的殖民地臺灣，獲得了一個可以接近權力中心、晉身社會上層的場域。

三、「外地經驗」的延長

回到日本內地的 1932 年到出發至滿洲的 1935 年間，鏡子稱之為「失意時代」。從地理上「邊陲的中心」臺灣，回到「帝國的中心」日本本土，鏡子失去活躍的舞臺。然而在蒙古、臺灣的經驗及人際網絡，仍在返日後的生活中持續發酵。修養團的標語「愛與汗」、與婦人修養會成員往來所培養的教育理想、蒙古和臺灣經驗所堅定的國家意識、開拓熱忱等，亦隨著鏡子的返日而在另一個空間實踐，並左右了其後的人生方向。

回到日本的高橋夫婦，「從三餐到找房子等麻煩的事」都暫時依賴兄、嫂，在玉川奧澤町（今世田谷區奧澤）覓得居住之處。鏡子辭去高等女子學院工作，與總督更迭下的人事變遷息息相關，因此一些在臺灣的故舊也回到日本本土。例如，曾任臺北高等學校校長的三澤糾與曾任文教局長、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校長的杉本良，皆在此一時期歸返日本。鏡子返日後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拜訪這些過去在臺灣有往來的友人。[96]與從蒙古返日之時不同，鏡子與在臺灣相識的教育界人士保持聯繫，同時展開新生活。

在臺灣活躍於婦人團體與教育活動，是鏡子時常懷念、回想的輝煌成果。鏡子也嘗試將過去的抱負與作法移植至日本：在東京參加多摩川青年修養會；並在下村菊千代（下村虎六郎之妻）的提案下，熱衷於糾合同志，成立「大成婦人修養會」。[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96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17-422。

97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21-425。

大成婦人修養會成立之際，曾受到下村虎六郎（1884-1955）[98]與田澤義鋪（1885-1944）[99]的居中牽線、協助，並在發起大會時邀請高良富子（1896-1993）[100]演講。下村與田澤皆是推動近代日本青年團運動的重要人物，可見大成婦人修養會的成立，存在著與日本本土社會教化運動合流的面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菊千代的提案為「創造臺北婦人修養會的延長」，[101]下村亦是繼三澤糾之後的臺北高等學校校長，就大成婦人修養會成立的動機和經過而言，顯然是鏡子臺灣經驗的移植，並受其人際關係延長之影響。

此外，鏡子對教育的熱情未曾稍減。1933 年春，利用在淨牧寺（今東久留米市淨牧院）境內的學舍，開辦「淨牧女子工藝學園」。鏡子擔任學監，園長為鏡子的兄長出口永吉，淨牧寺住持藤井顯孝擔任主事，

98 下村湖人，本名虎六郎，佐賀縣出身。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畢業後，歷任多所公立中學校、高等學校教師、校長，1925-1931 年曾擔任臺中州立第一中學校校長及臺北高等學校校長。1931 年離職後返日，協助高校、大學時代友人田澤義鋪從事社會教育。1933 年起任大日本聯合青年團講習所所長。以自傳性教養小說《次郎物語》聞名。下村在日本以人道主義、理想主義教育家而為人所知，在臺灣卻因其民族差別主義而為學生所厭惡。關於下村的臺灣經驗、與田澤義鋪的交友、在臺日兩地的形象落差，詳見張季琳，〈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和《次郎物語》〉，《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7 卷第 3 期（2007，臺北），頁 201-221；張季琳，《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東京：東方書店，2009）。

99 田澤義鋪，佐賀縣出身。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1910 年任靜岡縣安倍郡郡長之際，以地方自治振興為目標，擔任青年團的指導，並與蓮沼門三的修養團共鳴。1924 年創立「新政社」，創辦《新政》雜誌，之後與山下義信主辦的雜誌《大成》合併。1925 年大日本聯合青年團成立後，擔任常任理事，1934 年就任理事長。〔日〕荻原建次郎，〈近代日本思想における主体形成の論理——田澤義鋪を手がかりに〉，《駒澤大學教育學研究論集》第 19 号（2003，東京），頁 23-38；〔日〕長清子，〈田澤義鋪の人間形成論——青年団教育に追求した国民主義の課題〉，《國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I-A 教育研究》第 10 号（1963，東京），頁 41-93。

100 高良とみ，舊姓和田，富山縣出身，日本女子大學畢業，曾任日本女子大學教授，戰時曾任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議員、大政翼賛会中央協力会議婦人代表。〔日〕加藤周一編，《世界大百科事典》CD-ROM（東京：日立デジタル平凡社，1998）。千野陽一，《近代日本婦人教育史》，頁 316、328。

101 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師則有高良富子、杉本良、大成婦人修養會的會員高橋清子等。[102]學園的人事，橫跨了鏡子的兄長及在臺灣累積的人脈，以及基於臺灣經驗的延長而成立的大成婦人修養會會員。

淨牧女子工藝學園強調將信仰和勤勞融入教育之中，這一點是主事藤井顯孝和鏡子教育理念共通之處，也是學園得以成立的緣由。鏡子自述學園成立的背景，乃基於「希望能夠為國家出力。一生奉獻給教育界，在這世間立下紀念塔」的想法。實現「在臺灣和乙守先生談及的女子教育理想論」之願望，支撐著鏡子辦學的行動。[103]從辦學的理念、獻身教育的想法與發言，可以窺見臺北婦人修養會標語「流汗相愛」、蒙古見聞的發酵，以及婦人修養會、高等女子學院等在臺灣結識之盟友的影響。

除此之外，鏡子也開始為成立滿蒙學校女子部而奔走。由於和藤井顯孝在信仰上存在著佛教與惟神道之間的歧異，再加上受到杉本良所說「這裡的學生們都很踏實，如果可以將這樣的人送往滿洲一帶當新娘就好了」的影響，鏡子退出了學園的經營，朝著新的目標邁進。鏡子前往位在神田三崎町的滿蒙學校，拜訪校長山田陸槌中將，遞上自己的著作《女性踏破的滿蒙》，並表示：「滿洲若只有男子前往，殖民地不會成功，滿蒙學校務必設立女子部。」校方接受了鏡子的提案，開始募集女學生，然而，應募者只有 6 名。鏡子擔憂募集狀況不佳，恐導致女子部無法成立，多次拜訪山田校長，表明即便只有 6 名學生，也願意繼續執行的心願。[104] 1933 年第二學期（9 月）開始，滿蒙學校終於敲定設立女子部。[105]

滿蒙學校於滿洲國成立的 1932 年 3 月開始籌設，入學相關文件〈滿蒙學校入學案內〉中提及新成立的滿洲國資源豐富，等待同胞前往開發，學校成立的宗旨在培養中堅指導者，授予新滿洲國諸般的正確知識。並

102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46-447、423。
103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42-443。
104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48-457。
105 〈満蒙学校に女子部を新設　高橋鏡子女史の活躍〉，《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9 月 8 日，第 7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強調學校之特色為「顧問、校長、教授皆與滿蒙新國家的成立密切相關」，成立之初的顧問群包含了貴族院議員石渡敏一、拓務大臣秦豐助、元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等人。[106] 1933 年的顧問則有文相鳩山一郎、拓務大臣永井柳太郎、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107]足見滿蒙學校與內閣及陸軍關係匪淺，其成立亦與向滿洲擴張的國策一致。

由於鏡子和臺灣的淵源，滿蒙學校設立女子部的新聞，也以〈滿蒙学校に女子部を新設　高橋鏡子女史の活躍（滿蒙學校新設女子部 高橋鏡子女史之活躍）〉為標題，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根據這則新聞報導，女子部的教師「聚集了具有滿蒙知識和體驗者」，「關於到滿洲工作、結婚，盡可能的給予方便」，教育內容「從支那語、蒙古語等滿蒙事情，到烹飪、生產加工等方面的教授，特別將重點放在精神上的訓練」；女子部設立的目的在於養成「能夠幫助那些決心埋骨於滿蒙天地之男子，思想堅固且對滿蒙有理解的女子」，這是由於「海外發展若像以往那般任由娘子軍先行的話，將不會成功，基於這樣的見地，讓有教養、真正有自覺的婦人先行乃是當務之急」。[108]這則新聞報導所介紹的女子部設立理念與想法，與鏡子自身向外移動的理念及在論述中反覆強調的「輔佐男子、向外開拓」之觀點如出一轍，也可以窺見鏡子「想培養新娘送至滿蒙」的願望。這樣的想法也可以看到女學校地理教師所

106 〈滿蒙學校設立計畫ニ關スル件〉（1932.4.14），收於〈本邦学校関係雑件 第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Ｉ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類　文化、文化施設」；〈滿蒙學校開校ニ関スル件〉（1932.5.4），收於〈本邦ニ於ケル教育制度並状況関係雑件 第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類　文化、文化施設」。

107 〈滿蒙学校に女子部を新設　高橋鏡子女史の活躍〉，《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9 月 8 日，第 7 版。滿蒙學校 1932 年成立，至女子部成立的 1933 年，這段期間橫跨犬養毅內閣（1931.12.13-1932.5.26）與齋藤實內閣（1932.5.26- 1934.7.8），內閣閣員、關東軍司令官名單參照日本史広辞典編集委員会，《日本史要覧》（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頁 152、171。

108 〈滿蒙学校に女子部を新設　高橋鏡子女史の活躍〉，《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9 月 8 日，第 7 版。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說的「日本的殖民地因為娘子軍先行渡航，所以殖民政策終歸失敗，必須讓更有教養的女性幫助男性渡航海外才行」想法的影子。[109]除了時局的影響之外，歷經的蒙古與臺灣經驗，更讓朦朧的意識成為鏡子切身的體驗，具體形塑其國家觀與女子教育之想法，並付諸實現。順帶一提，女子部在隔年的 1934 年 3 月，送出了 4 名畢業生前往滿洲，這是最初也是最後的女子部學生。[110]

滿洲移民自 1932 年起是國策事業，滿洲「大陸新娘」的相關研究中指出，最初送出移民新娘為 1934 年 4 月，為數 30 人。構思者為第一批武裝移民的當地負責人、關東軍的東宮鐵男（張作霖暗殺事件首謀者，1892-1937）。1932 年 12 月，他眼見移民精神動搖，便開始構思移民新娘的計畫。「大陸新娘」的培養開始組織化，則要到 1937 年以後，各地開始出現女子拓務訓練所、女子拓殖講習會等，名稱因地而異，如「滿蒙開拓花嫁學校」、「滿蒙開拓女子青年塾」等。[111]從這些現象來看，鏡子雖不是滿洲「大陸新娘」最初的構想者，滿蒙學校送出女子畢業生的規模遠不及第一批「大陸新娘」，其後也未繼續，但女子畢業生前往滿洲的時間點早於第一批「大陸新娘」，顯見鏡子敏銳地察知時局和情勢的變化，在「培養新娘至滿蒙」的行動上也具有先驅性。

除了淨牧女子工藝學園、滿蒙學校女子部的設立之外，約當同一時期，鏡子照顧兩名來自滿洲國齊齊哈爾、準備在日本應試而到東京的蒙古人女子，以私塾的形式指導他們日本語。過程中，淨牧女子工藝學園的學生以及滿蒙學校女子部的學生亦加入，私塾逐漸整備成女塾形態。鏡子並在住家附近租借房屋，奉祀天照大神，熱衷於「精神指導」，同時，經常邀集大成婦人修養會、陸軍方面親友的夫人們、教育界友人，

109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4-45、253、450。

110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58。

111 滿洲「大陸新娘」相關討論見：〔日〕相庭和彥等著，《満洲「大陸の花嫁」はどうつくられたか：戦時期教育史の空白にせまる》（東京：明石書房，1996）；〔日〕杉山春，《満州女塾》（東京：新潮社，1996）；〔日〕陳野守正，《満州に送られた女たち：大陸の花嫁》（東京：梨の木舎，19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指導學生們談話時的用字遣詞、教養、茶道、插花等，有時也請他們為學生進行精神講話。[112]

成立婦人修養會、投身於教育活動之外，鏡子還利用這個「失意時代」，整理自己的蒙古和臺灣經驗，寫作《女性踏破的滿蒙》和《映在女性眼中的蓬萊之島》。

《女性踏破的滿蒙》可以說是《寄自蒙古內陸》的後篇，將後者出版之後新增的一些報導、書寫加入，整理成卷出版。因此，《女性踏破的滿蒙》前半幾乎與《寄自蒙古內陸》內容相同，只刪改一些文字。然而，在相同事件的記述中，鏡子往往加上了新的感想。如同前述，1933年出版的《女性踏破的滿蒙》比起 1922 年的《寄自蒙古內陸》，國家意識和教育觀都以更鮮明的形式呈現。

另一方面，兄長的人脈網絡與鏡子自身在臺灣累積的人際資源，依然成為鏡子書寫活動的重要支柱。《女性踏破的滿蒙》在出版之際，因經費問題，兄長永吉向偕行社記事編輯長中村照治（陸軍大佐）求助。斡旋的結果，書籍由砂田軍用印刷屋印刷。永吉設計文案，請陸軍大臣荒木貞夫題字「皇威輝異域」。此外，因杉本良的介紹，透過當時的拓務省局長生駒高常，獲得拓務大臣永井柳太郎的題字「大人格即大日本」。[113]在這些人際網絡穿梭下所獲得的政府高官題字，不但為鏡子著作扉頁添上錦帶，也相當於承認鏡子為女性向外開拓者的先鋒，對其行為與言論賦予權威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踏破的滿蒙》出版的時間點，是滿洲國成立的隔年（1933）。也就是說，鏡子將過去的蒙古經驗重新整理、出版，其實是配合著時局與情勢。鏡子再度乘著時代之風，憑藉著自身的蒙古經驗，將自己推上國家向外擴張的舞臺。另一方面，對企圖推動滿洲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2 日常的禮儀、進退由田島あい子擔任，插花與茶道為婦人修養會的高橋清子，精神講話則由大倉精神文化研究所的大倉邦彥及高橋壯吉、與壯吉同期的松下芳男擔任。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60-465。

113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25。

民、獎勵開拓的日本帝國而言，鏡子的言論，是一種再好不過的宣傳，鏡子不只是滿蒙開拓的經驗者，也是代言者、鼓吹者。周遭的親人、與陸軍的關係、臺灣、蒙古經驗等，使鏡子的腳步無論在地理疆界上或思想言論上，都逐漸與帝國的步伐一致。而鏡子自身的言論、著作與行動，又支持並參與了日本帝國向外擴張的過程。

在此若將鏡子積極的論述及行動與前述協助大成婦人修養會成立的田澤義鋪做一比較，或可凸顯鏡子的國家意識。田澤義鋪雖推動青年團，但其教育、修養思想與天皇制國家設計下的國家主義教育不同，追求國民主義，強調個人與全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保持自立性。田澤的思想雖然欠缺國家和個人的對決，未能阻止侵略主義，反而存在被國家利用的面向，但他在戰時曾批判軍部，拒絕入閣且未加入大政翼贊會。[114]反之，鏡子卻以絕對的家族國家觀、神道信仰為修養的主軸，並在戰爭時期積極參與國家的向外擴張。

1935 年 9 月，鏡子受到時任哈爾濱學院[115]院長的三澤糾之邀，前往哈爾濱學院任職。起初，對於三澤的邀請，鏡子回以「無法留下外子，獨身前往，若允許兩個人同行則加以考慮」，與三澤商談不果，放棄前往滿洲。半年後，對於三澤的再度邀約，鏡子的條件為：「若給外子工作，我隨行的話，便沒有話說」，夫妻兩人終於渡滿。[116]壯吉擔任舍監

114 荻原建次郎，〈近代日本思想における主体形成の論理〉，《駒澤大學教育學研究論集》第 19 号，頁 23-38；長清子，〈田澤義鋪の人間形成論〉，《國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I-A 教育研究》第 10 号，頁 41-93；瀬川大，〈「修養」研究の現在〉，《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教育学研究室　研究室紀要》第 31 号，頁 49。

115 哈爾濱學院為後藤新平（1857-1929）於 1920 年設立的俄語學習專門學校。設立之初名為日露協會學校，滿洲國成立後，1933 年 4 月更名為滿洲國立哈爾濱學院。〔日〕芳地隆之，《ハルビン学院と満州国》（東京：新潮社，1999），頁 11、122。

116 關於前往滿洲國的時間，鏡子提及前往哈爾濱的日期為 9 月 25 日，前往滿洲途經旅順時，拜訪曾任文教局社會課課長、時任關東州廳長官的竹下豐次，竹下任關東州廳長官的時間為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936 年 6 月 19 日，由此推測鏡子是 1935 年 9 月出發至滿洲。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81-493；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9；日本史広辞典編集委員会，《日本史要覧》，頁 1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務人員，處理會計，鏡子依然擔任舍監，與學生同住宿舍內。[117]在滿洲居住八年，鏡子因罹患赤痢，在中日開戰後的 1943 年回到日本。[118]三澤之所以邀請鏡子前往滿洲，不單只是在臺灣築起的人際關係，鏡子強烈主張滿蒙的開拓，以及自身擁有的蒙古經驗，或許都是重要因素。

事實上，鏡子鼓吹的主張和實際的行動，以及女性所居的位置，在這次的移動中顯現了弔詭的現象。鏡子再三呼籲女性也應向外移動、輔佐男性，以為國效力，但是在面對可以前往滿洲「為國效勞」的機會之時，卻以家庭為重，以丈夫的生計為優先考量。另外，鏡子此次的向外移動，與此前的「位置」大不相同，從過去的「從屬」轉換為「主角」的位置。1920 年前往蒙古，是透過夫家的人際網絡。1924 年渡航臺灣，是仰賴兄長的安排，透過兄長的人際網絡在臺灣覓得工作與安身之處。1935 年前往滿洲，則是依靠自身所累積的外地經驗與人際網絡。雖然，表面上是「給外子工作，我隨行」，但實際上是丈夫壯吉因妻子鏡子的關係而獲得工作，「婦唱夫隨」才是實態，家庭秩序從原本「從夫」、「從兄」，轉變為「從妻」。國家、家庭之間，男性、女性之間的優先位置，在言論與實態上，呈顯了糾結而矛盾的狀態。

結　語

本文嘗試追探一位中間層女性的移動，探問其移動的軌跡、移動所帶來的經驗、思想上的變化，以及位於社會與國家之間個人的處境與變動。若再次思考這些移動的軌跡，除了歷時性的變化之外，還可以發現

117 從筆者所找到的哈爾濱學院相關文件中，可以確認 1937-1938 年兩人任職的資料，壯吉為「寮監事務囑託」，鏡子為「寮母」（舍監）。〈哈爾賓學院事務報告 昭和十二年中〉、〈哈爾賓學院事業報告 昭和十三年中〉，收於〈哈爾濱学院関係雑件 第二巻〉、〈哈爾濱学院関係雑件 第三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H 門 東方文化事業／6 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

118 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移動」、「跨界」，不只是地理疆界上的移動越境，還包含社會階層的移動、男性／女性的社會規範界線的移動、越界；國與家之間界線的移動。以下試著從這些不同的「境界線」，思考「移動」背後所具有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時代意義。

從地理疆界的移動與越境來看，鏡子在日本女性足跡罕至內蒙的時代，打著產業開發的旗幟，隨丈夫前往內蒙古，在異地生活三年，之後又仰賴兄長的人際網絡渡航臺灣；回到日本後，再次因殖民地臺灣所築起的人際網絡移動至滿洲。從蒙古、臺灣到滿洲，鏡子的移動，跨越了地理的疆界，卻不脫日本帝國勢力範圍，可以說是日本帝國向外擴張背景下的產物，鏡子的腳步隨著日本帝國的向外擴張而移動。

鏡子的越境，看似只有地理疆界的移動，其實還牽涉了日本帝國內部及外部社會環境的變動與社會階層的流動。明治維新以後，武士階級解體，士族階層必須尋找、開拓新的生存之道。鏡子出身士族家庭即其典型。基於名譽意識，順從母親的期待，兩位兄長皆成為近似武士階級、擁有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軍人，鏡子自身也成為具獨立經濟能力的教師。而日本帝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疆域上的向外擴張，則提供了舊士族階層尋找新生活、開展可能性的空間。

另一方面，殖民地臺灣，則為鏡子提供了一個社會階層上升的場域。參加婦人修養會，獲得與高官夫人交際往來的機會，其舉辦的活動也成為自我實現的途徑。在地理疆界上，從日本帝國的中心移動至邊陲，在社會階層上，從舊士族／中間層／被日本本土排除的邊緣，移動至殖民地臺灣日人社會的上層。

不過，有趣的是，當鏡子的社會位置向上移動時，和臺灣本地社會的互動反而變得封閉。鏡子居留蒙古之時，由於日本人人數不多，特別是女性只有鏡子一人，在書中常提及與蒙古人的往來，描寫當地風土民情、參加當地人的婚禮，甚至刊載與蒙古女性的合照。相對於此，在臺灣的鏡子，幾乎以日本人為社交圈，工作場域亦是以日本兒童為主的小學校，除了參加「全日本婦人經濟大會」時提及同為參加者的臺灣女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外，幾乎不見與臺灣人之間的互動，亦即與臺灣本地社會之間的互動是受限的，即便有接觸，亦限於上層社會極少數的臺灣女性。在民族關係上，不見鏡子跨越「界線」，反而是封閉於日人社會集團之中。

明治維新後社會的變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步步向外擴張勢力範圍的日本帝國，內外環境的變動，一方面使舊士族必須因應，一方面也提供了求生之道。鏡子在變動中獲得自立的能力，也醞釀了向外移動的自主性與主動性。但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時間點、相同的外在環境下，並非人人都像鏡子這般，毅然前往被視為「荒野」、女性難以到達的蒙古，並且抱持著強烈的國家意識，在殖民地臺灣從事教育活動，甚至晉身上流婦人社會。這些歷程顯示了鏡子的主動性與特殊性。

從思想的轉變與確立來看，鏡子的步伐也與帝國齊步俱進。期待女性在帝國經營上有所貢獻的輿論潮流中，女學校教師的一番話，在鏡子的心中萌芽、發酵，影響了鏡子前往蒙古的決心。1920 年代鏡子的書寫中，國家意識尚朦朧不明，然而在經歷了蒙古和臺灣的活動、與社會教育者的接觸等，鏡子的國家意識逐漸明確，教育觀也開始強調融入勤勞與信仰，並將己身的位置定位為獻身教育、以培養能夠輔佐男性向外開拓的女性為職志。這些外地經驗，讓鏡子從日本帝國的外緣看到了日本帝國，並且清楚描繪女性在帝國中的位置。

以家庭內的位置來看，鏡子婚後的人際網絡受到兄長和丈夫兩方面的影響。與兄長為其物色的相親對象結婚，意味了與丈夫的人際網絡之連結乃以兄長的人際網絡為起點展開。而鏡子週遭多為與陸軍有淵源者，也影響其思想與行動。從日本本土到異地蒙古、外地臺灣的足跡，是以丈夫的不順遂為起點，身為陸軍的兄長，則串起了人際網絡與移動的路徑。鏡子前往蒙古是從夫，渡航臺灣為從兄。然而，身為教師的外地生活，鏡子逐漸築起自身的人脈網絡，從「家內」走向「家外」。並且，在臺灣築起的人脈資源，在歸返日本本土後依然靈活運用，在蒙古、臺灣累積的教育經驗，也反向移植回日本。其後，渡航滿洲，已不再是依賴丈夫或兄長的人脈網絡，而是基於自己的人際資源，甚至，丈夫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鏡子之故在滿洲謀得一職。鏡子在家庭的位置，已從「從兄、從夫」轉變為「夫從」了。在國家意識與教育觀上，也從賢妻良母主義，逐漸發展出自己的詮釋，基於自身的蒙古經驗，強調女性的移動在國家發展上扮演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與家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在鏡子的論述和實際生活中，似乎出現了糾結不一致的狀況。在《感激的回想》中，鏡子描繪了許多女性形象，頻頻運用「典型的日本婦人」這樣的語彙。這些女性形象的描繪，訴說了鏡子不斷地在探尋理想的女性典範。鏡子所描繪的「典型的日本婦人」，是「為了家族拋擲自己的一切，侍奉長上，獻身於子女的教育，祈求一門的繁盛」，並將這些舉動解釋為「滅私奉公」。此外，「女性痛快地捨棄自我的一切，洗淨家族之譜系，圖謀子孫之繁榮，乃真正的使命」，[119]意味著犧牲自己成就家族的繁榮，將女性配置在家庭內部，定位在幫助男性／家業的輔佐地位。這是鏡子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主張女性向外開拓也應在這層意義上理解。然而另一方面，鏡子自身的行為、舉動和言論，已非如此單純地可以在「家內」的範疇中理解，而是搖擺於國家與家庭之間。在其鼓舞女性勇赴海外發展的論述中，雖將女性放在「幫助男子」的位置上，但也可以看到強調基於國家愛、藉由修養以培養能力等積極主動的面向。這一點，應可理解為鏡子所受的教育與自身蒙古經驗揉合的結果。此外，鏡子自身的活動主要以學校和社會教育為中心，幾乎不見「安住於家」的角色，遠遠超過其自身所描繪的「典型日本婦人」之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居住臺灣期間，鏡子得以參加婦人修養會並專注於社會教育，乃受惠於同居的養女與安藤元節的岳母幫忙處理家務之故。[120]回到日本本土著手成立學園的鏡子，曾如此自述當時的心境：「欲忠於教育，便無法顧家。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9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53、56。洗淨家族之系譜，原文為「家の流れを清め」，意指讓家族代代皆無污名。

120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35-341、348。

家事，便無法顧及學校。每日重複著日暮道遠的狀態」。[121]顯現了在「家」與「國」之間，不知如何擺放自身位置的難局。

看似菁英女性的鏡子，若追探其境遇，顯現遭逢不遇、身處日本社會邊陲，而向帝國新天地尋求可能性。在外地尋找、開展可能性的過程中，重新定位自身存在的重要性，並賦予意義。每當獲得施展的場域，國家觀念便重新被強調確立。這樣的樣貌，反映了在臺灣佔據社會地位上層、但在日本內地實則身處社會邊陲的一部分日本人之樣貌，也提醒我們帝國擴張的過程中，一些與鏡子處境相似、在殖民地工作、生活的教師與作家等中間層女性之存在。

*本文初稿〈越境する女——高橋鏡子の満蒙、台湾経験と国家意識〉曾於 2011 年 5 月「日本台灣學會第十三回學術大會」中宣讀，感謝評論人洪郁如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諸多具啟發性的意見。修改與出版過程中，承蒙周婉窈、呂紹理、陳翠蓮、楊典鋸教授、大川敬藏先生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讓本文更加完善周詳，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曾憲緯　校對：林紋沛　李盈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1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47-448。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內蒙古教育志》編委会編，《內蒙古教育史志資料》。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5。

〈堅實な婦人達によつて新しい團體が作られる 「婦人修養會」と名乘つて來月下旬發會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28 日，第 7 版。

〈臺北婦人修養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2 月 17 日（夕刊），第 2 版。

〈臺北女子高等學院紀事〉，《臺灣教育》346 號，1931 年 5 月，臺北，頁 90-95。

〈満蒙学校に女子部を新設　高橋鏡子女史の活躍〉，《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9 月 8 日，第 7 版。

〈本邦外国間合弁会社関係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3 門 通商／3 類 商業／2 項　会社、組合」。

〈蒙古農牧事業関係雑件 第一巻〉、〈蒙古農牧事業関係雑件 第二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 門 政治／7 類　国際企業／7 項　農牧及租借」。

〈本邦ニ於ケル教育制度並状況関係雑件 第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Ｉ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 類　文化、文化施設」。

〈本邦学校関係雑件 第一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Ｉ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会問題／1 類　文化、文化施設」。

〈哈爾濱学院関係雑件 第二巻〉、〈哈爾濱学院関係雑件 第三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H 門　東方文化事業／6 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

大日本聯合婦人會，《系統婦人の指導と経営》。東京：大日本聯合婦人會，1935。

內務省社会局編，《全国処女会婦人会の概況》。東京：內務省社会局，1921。

婦人修養會編，《婦人修養の栞》。東京：婦女界社，1923。

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4。

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5-1931。

〔日〕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

〔日〕朽木寒三，《馬賊天鬼將軍傳》。東京：德間書店，1981。

〔日〕朽木寒三，《續・馬賊天鬼將軍傳》。東京：德間書店，1981。

〔日〕高橋鏡子，《蒙古の奥から》。東京：庚申堂，1922。

〔日〕高橋鏡子，〈朝起き〉，《宇宙的心》1929 年 2 月号，臺北，頁 22-24。

〔日〕高橋鏡子，〈春の満州名物〉，《宇宙的心》1929 年 4 月号，臺北，頁 37-39。

〔日〕高橋鏡子，〈国家的目標と勇気〉，《宇宙的心》1929 年 6 月号，臺北，頁 28-31。

〔日〕高橋鏡子，〈小原先生に就いての感想〉，《第一教育》第 8 巻 11 号，1929 年 12 月，臺北，頁 36-38。

〔日〕高橋鏡子，〈雛祭について〉，《社会事業の友》第 16 号，1930 年 3 月，臺北，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2-56。
〔日〕高橋鏡子、乙守玉緒，〈女子専門校の設立と母親の願ひ〉，《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5 月 31 日（夕刊），第 3 版。
〔日〕高橋鏡子，〈ゴールド夫人を送りて〉，《臺灣教育》336 号，1930 年 7 月，臺北，頁 98-102。
〔日〕高橋鏡子，〈補充すべき修身教材に就て〉，《臺灣教育》339 号，1930 年 10 月，臺北，頁 30-33。
〔日〕高橋鏡子，〈社会の罪〉，《社会事業の友》第 26 号，1931 年 1 月，臺北，頁 33-35。
〔日〕高橋鏡子，〈教育家としての母〉，《臺灣教育》355 号，1932 年 2 月，臺北，頁 130-131。
〔日〕高橋鏡子，〈修身科の採点に就いて〉，《臺灣教育》359 号，1932 年 6 月，臺北，頁 41-44。
〔日〕高橋鏡子，《女性に映じたる蓬莱ヶ島》。東京：秀陽社図書出版部，1933。
〔日〕高橋鏡子，《女性の踏破せる満蒙》。東京：日本軍用図書株式会社，1933。
〔日〕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東京：乙守玉緒，1942；大空社 1992 年復刻。
〔日〕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1966，東京，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良友會編，財團法人臺灣協會藏，頁 6-12。
〔日〕杉本良，〈ご挨拶〉，《良友》期號不明，1985，東京，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良友會編，財團法人臺灣協會藏，頁 3-8。
〔日〕西川虎次郎，〈南満州及東部内蒙古ノ境界に関スル意見送付ノ件〉（1915.8.1），收入栗原健編著，《対満蒙政策史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
〔日〕宮川次郎，《糖業禮讃》。臺北：臺灣糖業研究所，1928。
〔日〕鈴木裕子編，《日本女性運動資料集成 第 2 巻 思想・政治》。東京：不二出版，1996。
〔日〕鳥居きみ子，《蒙古行》，明治 39 年（1906）刊，收入《明治シルクロード探検紀行文集成 第 18 巻》。東京：ゆまに書房，1988。
〔日〕鳥居きみ子，《土俗学上より観たる蒙古》。東京：大鐙閣，1927。
〔日〕鳥居龍蔵，《ある老学徒の手記》。東京：朝日新聞社，1953。
〔日〕栃内壬五郎，〈満蒙に於ける羊毛改良事業〉，《満蒙実業彙報》第 34 号，1919 年 1 月，大連，頁 1-4。
〔日〕鈴木譲三郎，〈昭和大御代と日本女子〉，《臺灣警察協会雑誌》145 号，1929 年 7 月，臺北，頁 209-214。
〔日〕豊田英雄編，《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

二、近人研究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沖繩婦女與台灣殖民地統治〉，收入氏著，《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　海，《日本在內蒙古殖民統治政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第 33 期，2004，臺北，頁 315-363。
洪郁如，〈學歷、女性、殖民地：從台北女子高等學院論日治時期女子高等教育問題〉，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台灣學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
張季琳，〈下村湖人的臺灣經驗和《次郎物語》〉，《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7 卷第 3 期，2007，臺北，頁 201-221。
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2004，臺北，頁 79-116。
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台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入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李相哲，《満州における日本人経営新聞の歴史》。東京：凱風社，2000。
洪郁如，〈女子高等教育の植民地的展開——私立台北女子高等学院を中心に〉，收入〔日〕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機会拡張と社会的相克》。京都：昭和堂，2008。
洪郁如，〈日本の台湾支配と婦人団体——愛国婦人会台湾支部を中心にして——〉。東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論文，1995。
張季琳，《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東京：東方書店，2009。
顔杏如，〈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
ミルズ（Mills C. Wright）著，杉政孝訳，《ホワイト・カラー：中流階級の生活探究》。東京：創元社，1974。
日本史広辞典編集委員会，《日本史要覧》。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日〕千野陽一，《近代日本婦人教育史——体制内婦人団体の形成過程を中心に》。東京：ドメス出版，1979。
〔日〕小山静子，《家庭の生成と女性の国民化》。東京：勁草書房，1999。
〔日〕山崎朋子，〈蒙古女子教育に尽くした日本女性　河原操子と鳥居きみ子〉，收入氏著，《アジア女性交流史　明治・大正篇》。東京：筑摩書房，1995。
〔日〕中薗英助，《鳥居龍蔵伝：アジアを走破した人類学者》。東京：岩波書店，2005。
〔日〕井野瀬久美恵，《大英帝国という経験》。東京：講談社，2007。
〔日〕井野瀬久美恵，《女たちの大英帝国》。東京：講談社，1998。
〔日〕天野正子，《女子高等教育の座標》。東京：垣內出版，1986。
〔日〕加藤千香子，〈「帝国」日本における規範的女性像の形成——同時代の世界との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から〉，收入〔日〕早川紀代等編，《東アジアの国民国家形成とジェンダー　女性像をめぐって》。東京：青木書店，2007。
〔日〕加藤周一編，《世界大百科事典》CD-ROM，東京：日立デジタル平凡社，1998。
〔日〕広川佐保，〈蒙古産業公司をめぐる人々——「阿賀の館」訪問録〉，《近現代東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会 NEWS LETTER》第 15 號，2003，横濱，頁 118-122。
〔日〕寺出浩司，〈大正期における職員層生活の展開〉，收入日本生活学会編，《生活学》第 7 冊。東京：ドメス出版，1982。
〔日〕有吉広介、浜口晴彦編，《日本の新中間層》。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
〔日〕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東京：田畑書店，1995。
〔日〕佐々木啓子，《戦前期女子高等教育の量的拡大過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日〕佐々木啓子，〈伝統的規範から脱却した新中間層の女性たち——戦前期日本における女子高等教育拡大のメカニズム〉，收入〔日〕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機会拡張と社会的相克》。京都：昭和堂，2008。
〔日〕杉山春，《満州女塾》。東京：新潮社，1996。
〔日〕松村憲一，〈近代日本の教化政策と「修養」概念——蓮沼門三の「修養団」活動——〉，《社会科学討究》第 19 卷第 1 號，1973 年 12 月，東京，頁 1-26。
〔日〕芳地隆之，《ハルビン学院と満州国》。東京：新潮社，1999。
〔日〕長清子，〈田澤義鋪の人間形成論——青年団教育に追求した国民主義の課題〉，《國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I-A 教育研究》第 10 号，1963，東京，頁 41-93。
〔日〕相庭和彦等著，《満洲「大陸の花嫁」はどうつくられたか：戦時期教育史の空白にせまる》。東京：明石書房，1996。
〔日〕荻原建次郎，〈近代日本思想における主体形成の論理——田澤義鋪を手がかりに〉，《駒澤大學教育學研究論集》第 19 号，2003，東京，頁 23-38。
〔日〕秦郁彦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
〔日〕陳野守正，《満州に送られた女たち：大陸の花嫁》。東京：梨の木舎，1992。
〔日〕渡邊洋子，《近代日本女子社会教育成立史——処女会の全国組織化と指導思想》。東京：明石書店，1997。
〔日〕貴志俊彦等編，《二〇世紀満州歴史事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
〔日〕園田英弘、濱名篤、広田照幸，《士族の歴史社会学的研究——士族の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
〔日〕綱沢満昭，〈蓮沼門三について〉，《近畿大学教養学部紀要》第 29 卷第 2 號，1997 年 12 月，東大阪，頁 118-106。
〔日〕橋谷弘，〈神社と遊廓——日本植民地のシンボル〉，收入氏著，《帝国日本と植民地都市》。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日〕瀬川大，〈「修養」研究の現在〉，《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教育学研究室　研究室紀要》第 31 号，2005，東京，頁 47-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2 (Dec. 2013), pp. 251-30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3.52.04

In Step With the Empire: The Cross-boundary, Overseas Territory Experience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akahashi Kyouko

Yen, Hsin-ju*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Middle Class" woman, Takahashi Kyouko (1884-?), and reflects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Imperial expansion. Through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eek and explain the movement background, trajectory, and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e "cross bounda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cepts and educational views brought about by Kyouko's movement.

Kyouko was born into a family with samurai antecedents, and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After studying in Tokyo, she married and traveled as far as Inner Mongolia, Taiwan, and Manchukuo. Behind trajectory of this movement, lay the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Meiji Restoration, the pioneering consciousness of school education, a husband facing difficulties with work, and the initiative for women's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Imperia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erritory expansion, were interwoven and impacted by the abov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Kyouko opened a school in Mongolia, was active in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Japanese living in Taiwan, and took part in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women. Along with accumulating experiences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yenhsinju@ntu.edu.tw.

overseas territory (gaichi), and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variou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 Kyouko'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educational views wer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When the "Middle Class" was removed from the fringes of society within Japan, the border lands of the empire provided an area for one to come close to the power center and reach self-actualization. Cultivating and expanding her experiences in Mongolia and Taiwan also influenced her activities after returning to Japan, and they became more intertwined in the movement to Manchukuo. The movement also presen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ollowing the husband" and "following the older brother" to "the husband following along with the wife." Riding on the winds of the time, Kyouko also wrote a book about her experiences abroad, once more explaining her own beliefs and encouraged women to go abroad to break new ground. Kyouko herself also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empire, and viewed the Japanese Empire from the fringes of the empire itself.

Kyouko's movement was not only cross-boundary and followed the shift of geographical bord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was one of social mobility, and crossing over the boundaries of male / female social norms. At the same time, the link between and the dual dilemma of wavering between "home" and "country" can also be seen.

Keywords: Japanese Period, Japanese in Taiwan, Movement of Middle Class Women, Takahashi Kyouko, overseas territory experienc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